# 社史研究

# 通讯

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主办

2017-1

SHE SHI YAN JIU TONG XUN

1946年，陈学俊（左）在普渡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与同学合影。

1959年，陈学俊作为国庆十周年观礼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上。

1993年，陈学俊代表九三学社在全国政协八届一次会议上发言。

封面题字:韩启德
二〇一七年第一期（总第 14 期）
主　　办:九三学社中央研究室
主　　编:郭　悦
本期编辑:眷建军　於　亮　段正初
出版日期:2017 年 9 月

# 社史研究通讯

SHE SHI YAN JIU TONG XUN

## 目 录

Contents

**王选纪念专题**

03 王选遗嘱

03 王选是一个普通人 / 陈堃銶

06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在纪念王选同志诞辰 80 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 韩启德

**社史资料选登**

09 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 / 许德珩

13 过了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后的感慨 / 陈剑脩

15 赵家楼回忆记 / 潘　菽

17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三）

**专题研究**

21 九三社员推动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的历程及研究 / 周国民

25 论九三学社的语言文字工作者 / 张大英

29 穿军装的九三人 / 刘　华

**昨天与今天**

33 九三学社组织发展政策调整的轨迹 / 但　勇

36 卢于道与《科学画报》/ 陈　巍

**社史大家说**

39 褚辅成在狱中 / 王天松

45 浅析民主科学座谈会的真相 / 於　亮

# 目录
Contents


**社史人物**

48 杨振声（1890 — 1956）

48 严仁英（1913 — 2017）

49 傅世春（1916 — 2017）

49 陈学俊（1919 — 2017）

**消息与动态**

50 纪念吴阶平同志诞辰 100 周年座谈会举行

50 戴海青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50 纪念王选同志诞辰 8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50《九三学社上海先贤（第一辑）》出版

51 严仁英同志逝世

51 九三学社 8 位社员荣获 2017 年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51 纪念王淦昌诞辰 110 周年活动在常熟举行

52 杨钟健诞辰 12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举行

52 陈学俊同志逝世

52 纪念潘菽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 王选遗嘱

1. 人总有一死。这次患肺癌，即使有扩散，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向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轻度工作的水平，我还能为方正，尤其是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一旦医生会诊确定已全面转移，并经中医试验治疗无效，医生认为已为不治之症，只是延长寿命而已，则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的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力，这点恳请领导予以满足。

3. 我要带头推动‘安乐死’，在‘安乐死’或正常脑死亡时，立即捐献我身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角膜，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4. 我死之后，在取出有用器官后，请务必于 12 小时之内送火葬场，家属不要陪同，只需少数人执行，骨灰不保留。12小时内火化完成，就可以完全避免遗体告别、追悼会等我最最反对的程序。

5. 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不得用公款为我设基金，除非我和陈堃銶自己的捐款，才可考虑设基金，基金也不一定要用我的名字命名。

6. 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 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做出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7. 我对方正的未来充满信心，年轻的一代务必超越王选，走向世界。希望方正一代代领导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团结奋斗，更要爱才如命，提拔比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8. 我死后的财产全部属于妻子陈堃銶。我常说我一生有十个重大选择，其实我最幸运的是与陈堃銶结合，没有她就没有激光照排。由她决定何时捐出多少财产。她对名利看得非常淡薄。感谢关心我的领导、同事和同志们，务请按我遗嘱办事，有些未了的心愿，已口头交代给陈堃銶。

王选 2000. 10. 6

# 王选是一个普通人

陈堃銶

编者按：本文原载《中国政协》2006 年第 7 期。

王选去世后，社会各界悼念他，也有许多朋友对我表示慰问，借此机会我向大家表示感谢！

1975年初，我了解到国家有个《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项目，简称“748工程”，其中一个子项目是用于印刷的汉字精密照排系统。我同王选讲后，他为项目的难度和应用前景所吸引，很感兴趣。王选在大学毕业不久，因劳累过度曾患过重病，文革初期复发，当时他是在家修养的全休病号，身体正在好转，所以他有条件进行调研和设计。经过调研，他决定汉字采用数字化存储，之后很快认识到汉字存储量太大的问题成了系统的关键，所以他首先设计汉字信息压缩方法。经过几次反复，到 5 月份确定了“轮廓加参数”的方法，这个方法不但能保证文字变大变小时的质量，而且压缩倍数很高，500 万字节的容量，可以产生 65 万个汉字。上报给

学校后，学校很高兴，决定成立会战组。王选是当然成员，因为方案是我同他一起讨论并由我向学校汇报的，所以也有我。他原是无线电系的，我是数学系的，从此我们成了同事。所以我和他既是夫妻，又是合作最早、时间最长的同事。以后我配合他继续改进方案，和研究压缩信息复原成汉字的方法，并和同事们一起进行模拟试验，终于在1976年6月确定了数字存储、信息压缩、激光输出的完整的四代机方案。从此他成为整个系统设计的负责人，具体承担核心部分的硬件设计，我负责软件，我们一起确定软硬件的分工与配合。后来他成了单位的负责人，白天要处理各种事务，常常只能在晚上思考，有的难题就是睡不着的时候想出解决办法的。他总是一天三段忙，节假日更是干活的最好时机。奇怪的是，尽管劳累，他的身体却一天天地好起来了。

因为忙，我们俩平时说话的时间都很少，我为了让他歇歇，有时故意找些轻松的话题，他或是没听见，或是没说几句，又谈到工作上去了。我们吃饭常常是凑合，他也帮着做家务，但有时做着做着又跑去写起来了，我知道他总在想问题。只有1981年我患癌症时，他做了一个多月家务，尽心尽力地服侍我，每天看着菜谱烧菜。但我出院后，他很快就非常忙碌了，他说："看来我只能派急用！"

生活上的困难是次要的，因为国产元器件不过关，我们系统的稳定性很差，所以不少人主张进口。当时学校里时兴写论文、搞理论和出国进修，对我们这种工程性强的工作压力很大，不少同志回系去了。所以在取得初步成果后，有的同志提出应该见好就收，反正已经证明原理是对的，以后写写文章就行了。王选觉得如果到此为止，将来必然是进口设备的天下，我们的工作等于零。在那几年里我们听到的是一片反对声，有的说："北大设计的系统即使搞出来也是落后的！"有的说："外国设备展览之日就是你们垮台之时！"也有说："用不了多久，就会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有的协作单位提出："要我们参加，你们必须放弃'轮廓加参数'的压缩方案！"王选对国外的工作做了仔细调研，确认我们的方案远比国外系统先进，只要改善硬件条件，局面定会改观。在国家的支持下，大家充满信心，顶风度过了难关，经过几次升级换代，不但使所有进口厂商退出了中国，并使我们的产品出口海外，现在还进入了西文市场。使我国的报业、印刷业进行了彻底的技术改造。

随着事业的成功，他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人称他为当代毕昇，他很不同意，说："'当代毕昇'是一个集体！"1991年初出版了一本《王选传》，出版前我们没有看到封面和内容提要。后来他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说："这本书封面上和内容提要中的提法不妥，'中国激光照排之父'、'当代毕昇'等提法均把大家的功劳归于一人，……"他常常对我说，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我已经得了不少荣誉，但好处不能只归我们。一次我写了一篇投《计算机学报》的稿，他知道了说："学报上你已经有两篇稿了，这篇你就不要署名了！"后来就署了做具体工作同事的名。1980年我被提为副教授，按规定有成绩的5年后可以申请提教授，后来我们单位个别有贡献突出的同事，四年甚至三年就提了。1985年，Ⅱ型机在新华社每天使用，并通过了国家级鉴定，对软件的评价也不错，按说我可以申请提教授了，但王选要我同另一个同事一起提，他说："你再等两年，等他条件够了，同他一起提吧！"所以我是七年才提的。到了评博士生导师的时候，他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当博士生导师了！"上报了比我年轻的同事，讨论时遭到反对，才又改了我。后来一次报奖时，他把一位年轻同事的名字排在我前面，又是遭到大家反对才改的。开发新软件时，他说："你年纪大了，拼也拼不动了，就让年轻人干，让他们出彩吧！"我觉得很对，就做改进老软件工作，还因为我熟悉整个系统，正好可以编一些虽不起眼但又需要的程序，其中有的就只用一次。后来我带领研究生，开辟新的课题，并将软件协调工作交给了其他同志，我就彻底退出了第一线。

由于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观点相似，所以常常很少几句话彼此就都理解。我脾气急躁，他性格温和，所以很少发生矛盾。我有时说话偏激，他会指出哪几句不应该讲，他写的文章有不合适的地方，我向他指出，彼此都会接受。当然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譬如他出名后，采访他的人很多，我很不赞成。他说："这是媒体的任务，再说经过他们宣传，使更多人了解我们的工作，对推广、招聘都有利啊！"在处理有些矛盾时，我嫌他过于忍让，他说："你要多从对方的立场上考虑，譬如当年那些反对我们系统的人，其实都是好同志，他们只是按照惯例，不相信中国人能做好罢了。"个别同志对他有意见，他

说：“其实有些意见是误会，怪我没有同他多交换意见，实在是太忙了。”

在有的问题上，他是非常认真的。有一次协作单位在开发一个软件时，遇到了难关，我说我有办法解决，他听了立刻要我去教，当时这个单位和我们已经有了裂痕，所以我有抵触情绪不肯去，他对我发了脾气，这也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一次吵架。我冷静下来后自然是按他的意见去办，也明白他根本就不考虑成绩归哪个单位，只要做出来，算谁做的都行。在平时，他看见、听见不正确的做法或意见，也会直接指出，不拐弯抹角，不怕得罪人。有同志好心地要我转告他，即使看准了的问题也不要急于表态，他听后哈哈大笑说：“我办不到！”

2000年9月他病倒了，10月4日确诊为肺癌，出门的时候，医生指着他的背影，说出了使我五雷轰顶的四个字：“最多两年！”我强忍悲痛同他回了家，我知道他是累垮的、压垮的！

我回想这20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做出创造性成果并使之出口海外而努力。他认为应用性科技的成果要经得起市场的考验，才能对社会有实际贡献，所以他坚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他本来担任北大计算机研究所所长，尽管他认为自己没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和兴趣，后来也没有真正管理过企业，但为了工作需要，他在方正公司兼了职。以后还担任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这政、企、学三方面的工作十分劳累，但最累的是随着事业的发展，各种矛盾和问题都摆在他这个文弱书生的面前，使他难于应付，他总想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好，但处理复杂现实的难度，远远超过科研攻关遇到的难题。有时他面临巨大的压力，常常整夜不能合眼。幸而有领导和大家的支持，才度过一个个难关。但这种种情况使他的精力几乎耗尽。

也许是因为有过我患癌症的生死考验，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们都很冷静。确诊的第三天，他就写下了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人总有一死”，我知道他已经把生死置于度外，只考虑怎样度过今后有限的日子。他要我不隐瞒病情，每当出现新的情况，我们都一起讨论应该怎样面对，到了后来，他说：“管它什么情况，你去跟医生讨论就行了。”他已经完全不想自己的病，只是积极配合治疗，腾出精力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当治疗间隙，除了参加活动，他主要做两件事，一是写文章，从确诊到去世的1900多天里，有794天在治疗和住院，但他忍着病痛，写出了50多篇文章和讲话，他要把他用心血换来的体会供后人参考。再就是关心帮助年轻人才，他从亲身经历体会到支持爱护尚未出名、但有潜力的小人物的重要，所以他非常爱护年轻人才，尽量为单位的骨干创造有利的环境。他常找年轻人谈话，病后出门少了就通电话、发邮件，了解情况、鼓励帮助。尽管他左肺全肺切除后一直胸痛，后来的几次转移又引起多处疼痛，但他从不呻吟叫苦，只有在病情恶化以后，才轻轻对我说：“我实在痛苦！”其余大部分时间他常常喜笑颜开，与同事或朋友在一起时更是谈笑风生。住院期间常同医生、护士聊天、开玩笑。有人称他首长，他会玩笑着伸出手说：“我是这手掌！”我知道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普通人。

去年11月，他的病情恶化，完全不能进食，每天只能喝几口水和果汁，靠鼻饲营养液维持。即使这样，他还不肯躺在床上，坚持自己上厕所、自己洗澡，后来太虚弱了，才肯让我帮他洗。到去世前一天的今年2月12日，他发着烧，身体非常虚弱，大家叫他不要下床，但他还想撑着自己上厕所，我知道他特别不愿意麻烦人，这之后大约两小时他突然消化道出血不止。第二天上午我陪在他身边，眼看他停止呼吸和心跳，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这是他病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流泪，我知道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舍不得离开他的事业和亲人，但是他还是走了，以前每次出差，他总盼着早点回家，但这次他永远回不来了。

现在大家纪念他，给了他很高的评价，我想他若在地下有知，一定会觉得当之有愧。因为论成绩，我知道他始终认为工作是大家做的，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功劳不能都归于他。论为人处世，与许多老科学家相比，与许多努力工作但默默无闻的同志相比，并没有突出的地方，只是他比别人有更好的机会。所以我想只要建立正确的道德观，树立良好的社会风气，为更多的人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我国离建成创新型国家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本文作者为王选同志的夫人）

#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

## ——在纪念王选同志诞辰8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

韩启德

今天，我们满怀崇敬和思念之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王选同志诞辰8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我国科技教育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的杰出贡献，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

1937年，王选同志出生于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代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学校。开明的家庭教育和名师云集的学习环境，塑造了他善良正直、诚实宽厚的做人原则和好学笃行、勤于思考的学习作风。1954年，王选同志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56年分专业时，他看到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把计算技术列为重点发展学科，又了解到未来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将对国防和航天工业乃至人类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时，毅然决定攻读当时“冷门”的计算数学专业。这一选择，体现出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刻洞察力。1958年，留校不久的王选同志开始参与北大自行研制的中型计算机“红旗机”的设计工作，在科研上初露锋芒。然而，紧张的工作和严重的营养不良使他患上了重病。但他没有因此消沉，而是边养病边工作，沉淀知识、积蓄力量。1967年，王选同志和同事们一起完成了ALGOL60高级语言编译系统，这一成果也是国内最早得到真正推广的计算机高级语言。

1975年春，王选同志开始着手汉字精密照排系统的研究。当时，他只是北大一名38岁的普通助教。为节省复印费，他拖着病体手抄了许多资料；为节省5分钱的公交车费，他常常提前一站下车。王选同志曾经提出，搞科学技术一定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追求一流原始创新的科研成果，“立地”就是科研成果的大量推广和应用。他在充分研究国际技术发展趋势后，大胆提出跳过我国正在攻关的第二代、第三代照排机，直接研制世界上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在一片质疑声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攻关，最终取得成功，开创了汉字印刷的崭新时代，为祖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顶天”的目标完成以后，王选同志并没有满足，而是继续思考“立地”的问题。他积极致力于产学研相结合，走出了一条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道路。他们的产品占领了当时国内99%的报业和90%以上的书刊出版物，包括海外华文报刊80%以上的市场。王选同志的激光照排技术不仅成就了我国一个巨大的产业，同时也为我国真正的自主创新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晚年的王选同志更是一直在为自主创新鼓与呼，大力

支持创新。他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希望年轻一代“超越王选，走向世界”。他以自己的巨大努力和智慧，塑造了一座自主创新的丰碑。

王选同志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从 1995 年到 2006 年，王选同志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作为全国政协京昆室主任，他对民族传统艺术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亲自主持抢救昆曲艺术、弘扬京剧国粹工作，着力恢复了一些已失传的昆曲曲谱、已凋零的昆曲剧种和已关门的昆曲院团。他还多次把这些院团或演员请到北京座谈、参加文艺会演，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影响。他提出的《关于加大昆曲抢救和保护力度的几点建议》，得到胡锦涛、温家宝等同志的重要批示，对推进京昆剧的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

王选同志还先后担任过全国人大中国—菲律宾友好小组主席，外交部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务。他利用自己的特殊影响广泛结交各国朋友，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科技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王选同志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后，十分关心九三学社的工作。作为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巨大影响力和特有的亲和力，在九三学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据我所知，很多人就是看到九三学社有像王选同志这样优秀的科学家，才申请加入的。他这种形象，他这种吸引力，他这种无形的榜样力量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一些九三学社地方组织特别希望能听到他的报告，为此，王选同志总是尽量安排时间，满足他们的愿望。他以自己的出色工作，极大地增强了九三学社的凝聚力，赢得了全社广泛的尊敬和爱戴。

王选同志高度重视九三学社的履职工作和自身建设。他通过参加高层协商会、直通车、政协提案等多种方式，积极为国家发展、民族振兴和科技事业建言献策。他先后撰写《自主技术产品出口的若干思考》《试谈科研成功的因素》《自主创新要有超过外国人的决心和信心》《给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等文章，提出许多好的意见建议，对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他患病以后，九三学社不轻易安排他出席会议活动。但是，只要组织有需要，他仍会抱病参加。九三学社提出人才强社战略后，王选同志马上表示肯定，并且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把当年获奖的中青年科技人才列出了一个名单交给我，作为发展对象，其中列在第一位的就是潘建伟教授。王选同志对我说，我可以断定，他是一位顶尖的科学家。我们很快吸收潘建伟教授加入了九三学社。

王选同志非常关心九三学社的基层组织和普通社员。他多次参加九三学社北京大学委员会举办的新春联谊活动，与大家一起包饺子、拉家常，并对基层委员会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2005 年初，新一届北大学委员会成立，很多年富力强的中青年教授选进了委员会，为了支持他们开展工作，重病的王选欣然题词给予鼓励，并与他们畅谈自己参加民主党派工作的感受，以及多党合作的重要意义。九三学社有位同志的爱人得了和他一样的病，他和陈堃銶老师不仅热情地鼓励患者与疾病作斗争，还用自己的钱为患者从国外购买一种很贵的新药，每个月要 2 万多元。他们不仅记着什么时候药快吃完了，什么时候该把药送过去了，而且每次送药都要附上一封信，劝慰患者和家属不要在意费用，费用由他们承担。他们与患者连面都没有见过，只是因为患者是社员的家属。他们真的是对他人、对同志充满了关爱。

王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非凡业绩和杰出贡献，深深铭记在我们的心中；他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精神，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工作者树立了人生楷模。

今天我们纪念王选同志，就要学习他胸怀祖国、情系人民的爱国情操。王选同志在青年时期就立志成为一名为祖国、为人民贡 献聪明才智的科学工作者。他始终认为，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事业和前途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碰到什么样的挫折，他都始终秉持爱国奉献、振兴中华的强烈信念。即使在最后与疾病抗争的 5 年多时间里，

王选同志也从未忽略心中深深扎根的千秋家国之梦。2006年1月，王选同志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时候，咬紧牙关拿起笔，写下“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八字。这是他为《科技日报》成立二十周年的题词，也是他的绝笔，向人们表达了对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殷切期盼。我们向王选同志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始终保持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切情怀，勇于担当、不辱使命，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全部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纪念王选同志，就要学习他献身科学、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王选同志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关键就在于他对科学的热爱和激情。王选同志说，“一个献身于学术的人，就没有权利再像普通人那样生活，必然失掉常人所能享受的一些乐趣，也会得到常人所不能享受到的不少乐趣。”在北京大学，他最早住的地方也是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在一个非常破落的院子里，只有11平方米的一间小屋，他常常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解题、思考，他最主要的科学成就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的。王选同志一旦确立了研究目标，总是狂热地、忘我地去追求。他曾经感慨地说，“从1975年到1993年这18年中，我一直有种‘逆潮流而上’的感觉，这个过程是九死一生的，哪怕松一口气都不会有今天的成功。”他正是在这种“九死一生”的过程中，为我国的科学技术跨越式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我们向王选同志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先进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今天我们纪念王选同志，就要学习他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真诚合作的坚定信念。他衷心拥护和坚定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为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我们向王选同志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自觉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把老一辈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纪念王选同志，就要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为人梯的崇高品德。王选同志在科研成果和荣誉前面，始终强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曾经说过，“名人和普通人不应该有什么区别，名人要保持普通人的心态，别人尊重你，无非是自己过去有点贡献，仅此而已。”他多次强调，要做好科研，首先要做好人，而“关心别人与关心自己一样的人就是好人”。王选同志以提携后学为己任，为培养和造就年轻的学术骨干呕心沥血，千方百计地为优秀年轻人创造条件。王选同志认为，计算机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年轻人具有明显优势，所以他在自己56岁那年决定退出科研一线，全力扶持优秀的年轻人才独立开展工作。在他的培养下，一批敢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科 学家快速成长起来。我们向王选同志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做人做事，像他那样谦逊平和、朴实无华、提携后进，为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良好条件，保证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

王选同志在他2000年患病初期就写下的遗愿中说，“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作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我相信，他应该走得心安，死而无憾了。因为他已经贡献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他以自己不平凡的一生，印证了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光荣历史。

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带领人民走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王选同志孜孜以求并为之终身奋斗的伟大事业和美好理想正在一步步实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我们要把王选同志的精神化为实际行动，团结和带领全体社员，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以议政监督协商的新成果服务社会的新贡献自身建设的新成绩，迎接中共十九大和九三学社十一大的召开！这就是我们对王选同志的最好纪念。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

**编者按：**众所周知，九三学社与五四运动存在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我社的创始人中本身就有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积极分子。为了重温时代风潮，追溯精神血脉，纪念创社先贤，我们在此刊发三位亲历五四运动的重要创始人的旧文，分别是许德珩《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国民》杂志，2卷1期，1919年11月，第5—11页）、陈剑翛《过了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后的感慨》（《时代公论》1933年第60期，第29—32页）、潘菽《赵家楼回忆记》（《时与潮副刊》，1942年第一卷第2期，第47—50页）。其中，许德珩旧文由北京大学马学军提供，陈剑翛与潘菽的文章由九三学社秦皇岛市委会宣传部长邢克余提供，特此致谢。

# 五四运动与青年的觉悟

许德珩

自从德国打败了仗，巴黎和平会议开会，一般受不住战争惨祸而渴望和平的人，以为打倒了强权，伸张了公理，推翻了暴力，扶植了正义，世界上从此安宁，不会有什么杀人放火抢劫侵占的事情发生。更有那威尔逊十四个条件，做和平的保障，什么外交公开，缩小军备，废除密约，归还侵占的领土，恢复领土主权与那民族自决，殖民地开放，种种道义的呼声。可怜的伙计们，以前都没见过天日，听说有这种慈悲的大话，便丢了正经事不干，来欢呼正义，盼待和平，那晓得没等几久，比利时以一个仗义而牺牲最大的国家，他在和会上的地位，转不及阴谋诡诈丝毫没尽力的日本，那公理声中，就稍稍露点强权的影子。又没等几久，义大利为争富姆（Fiume）问题，拿退出和会为要挟，那正义声中，又带了十分暴力的采色。更近则胶洲一案，因为“伦敦密约”的关系，各人有自身的利害，就拿山东的权利，大大方方的送给日本。把威尔逊十四个条件，一齐推翻。什么强权哪，暴力哪，这些好名词我都不愿赐他，简单几句话，就是强盗分赃，花脸打抢，把那些无用的小孩子们哄在一块，凑凑热闹，摇旗呐喊，供他们的玩意儿罢了。

这些话说来都是闲言，列位那还不知道？不过我们回忆“五四”以前的境地，“衷怀愤激”，不自由的就写上上面一大堆废话了。

这是世界和平的不可靠，几位大人先生们和几尊大炮所放的“公理”“正义”不可靠，换一句话说，就是那时维尔色宫（ Versailles），充满了强权和暴力的空气。这也还不去管他，我们只问问我们自己究竟配不配享那种和平？应不应当受那种暴力的处分？我们有了这个疑问，把眼睛向国内一看，那些强盗军阀，他们欺负小民的本领、威武、暴力，比那分赃的强盗们利害。他对于意外的压迫，不惟靦颜承受，还要勾结元老院虚位以待的元老们来，东结个条约，西打个电报，分外讨好，弄得大家走途无路。像这种下等动物，那还够得上说什么和平！什么不受暴力的处分！不过只可怜了我们小民，凭空的带上一套枷，又加上一把锁，重重牢缚。还在兴高彩烈的说和平，待公理，岂不是在做梦？但是二十世纪的世界，是公理伸张的世界，是强权该倒的世界。二十世纪的人民，是应该主持人道，力求幸福的人民。这是一般人所公认的。因此，“五四运动”，所以翻天倒海的发生。

“五四运动”既是本人类求幸福的、人道的主张去伸张公理，反抗强权，但是我们中国人所受的痛苦，一方面是国外来的侵掠，一方面是国内生的军阀政府。这两种不祥的东西，都是人类的蟊贼。我们要想达到求真正幸福的目的，所以本互助的精神，牺牲的决心，对外反抗侵掠主义，实行“民族自决”。对内要打倒军阀政府，实行“国民自决”。这是叫“做五四运动”。他的目的，是在求幸福，他的手段是在牺牲，他的义意就是自决。

“牺牲”哪“自决”，几个月以来，这两种名词，几乎传遍了全国，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小贩也辍业，这种牺牲，在我们金字招牌的中华民国里边看起来也总算是破题儿第一遭。我现在总括这种牺牲，都叫他个“五四运动”，分析他来，看看对于社会上有什么影响。

共和国的名义，民国的牌子，在中国不是已经挂了八年了吗？名虽是个民国，其实除了多借些款，多发行些公债，多一批刮地皮的督军和班没廉耻的议员，以外，有那一点和小百姓生关系？又有那一点不比专制的满清还坏？这虽然是些卖国的官僚无耻，但是做主人翁的国民，又何尝问了半点儿闲事？自从有了这回运动，大家晓得我们自己的事，非我们自己去干或积极的监督不可。破除了以前倚赖与听从的迷梦。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一种影响。

这几年来，卖国营私的，那能胜数？法律二字，只能吓苦百姓，待穷朋友，正是庄生说的“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他国越卖得多，官越做得大，势力越雄厚，毒焰越伸张，任凭你大家怎样的不高兴，他坐起红牌子一号的铁板汽车来，荷枪持械的在两旁牢牢把着，东驰西骛，你能把他怎样？就是说舆论訾议罢，他若不耐烦时，还可赐你个非圣无法大逆不道的名儿，置你个安身无处，你又能把他怎样？自从有了这回运动，将那些党徒，稍稍惩罚，弄得他英雄无用武之处，表示个社会制裁和民众制裁的力量。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二种影响。

原来社会是农工商学等等人互相提携互相帮助所组织而成功的。中国的社会，虽然也有农工商学，但是除了农工或工商有自然或必要的交接外，他们当时，只知道作工贸易，从来没有彼团与此团联合组织的。那农工或工商之与学界，且不但没有联合的组织，并是老死不往来，格格不相入。自从有了这回运动，把这一条孔道凿通，成了一个民众大联合的趋向。虽然没普遍的进行，大家也总明晰联合的效用和他的必要，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三种影响。

中国人崇拜首领，是几千年帝制所遗传的性根。无论什么团体，他首领的意见，可以拿来做他们团体的主张，那分子大概是没有不服从的。这种性根，这种团体，好咧，也只能多造出几个英雄伟人来，若是坏咧，就要假公济私，在社会上造种种的罪恶。自从有了这回群众运动，本大多数人的福利为要求，拿群众的要求为主义，各人自有主张，不受他人的指挥和命令。所以不惟什么总长总理要倒霉，就是那商团工团学校，他们的会长、领袖，和某某长、某某主任，若不能拿多数人的意见或福利做主张，想以个人的私意指挥或命令全局，就虽不遭曹、章、陆一样的对待，恐怕也要给他一个滚蛋。这是打倒英雄，推翻首领的制度，破除以前崇拜的锢蔽思想，表示民众的真精神。是适合于Democracy的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第四种影响。

牺牲是人类求幸福的手段，若是没有一部分的牺牲，那幸福是不会从天外飞来的。大家看看朝鲜哪！为着自决两个字，死的，囚的，逃亡奔走的，有多少人？他想拿血肉来屈服枪弹，拿民众来抵抗军阀，这种牺牲，真个有精神！他们为的什么，无非是为同类争自由，求幸福。我们辛亥革命，虽然也有一部分的牺牲，但是多数人想利用势力，占便宜，走迳路，没有彻底的牺牲，没有放大牺牲的精神，所以弄来总归没收改革的效果。自从有了这回运动，罢学，罢工，罢市，大家晓得幸福是牺牲的代价，人人要向黑暗里放光明，要拿牺牲的手段去求幸福，猛勇向前，这是五四运动的第五种影响。

思想是作事的根本，思想顽固或腐旧，那他所做的所说的，恐怕也不是社会上所需要和群众所要求的。中国人的思想，向来是拢统的，因袭的，是崇拜和奴隶的，无论什么事，古人做的总不错，几千年后的今人，只可因袭崇拜，断不能加以考虑和批评。所以人的智识愈退化，社会也就愈不进步。自从有了这回运动，大家觉得旧有的东西，合于现在的人生与否，要发生个重要问题。所以对于社会、家庭，和人生的生活，要发生个“为什么”的问题。我数数自从“五四”到现在，全国新出版的新闻杂志，合计有一百二十多种，多半是对于“旧有的”怀疑，对于“现在的”要研求他一个“为什么”，去脱以前拢统因袭崇拜和奴隶的性质，这是思想改革的一个动机，是五四运动的第六种影响。

据我上来所说，有了这回运动，社会上又受了偌大的一个影响；一般听者，恐怕要作十分的乐观，说中国前途，从此有无限的光明希望。但是我陈述这种影响，并不是作什么乐观，为今日青年装点什么门面。我以为今日青年，受了各方面的逼促和国内外的逼迫，才有这回运动。本着人类的同情性（Sympathy）和自身的痛苦说起来，社会上稍稍的一点影响，也是应有的事。但是他那种影响，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是盲从的，还是理解的？是一时感情冲动的，还是由真正觉悟驱使的？前途的光明和黑暗，悲观和乐观，暂且按下分解。我且要问问我们青年，对于这回运动，有什么观感？有什么觉悟？

原来青年之在社会上，总算是最有希望的分子，一民族未来的发展和伟大的事业，总靠着青年身上。他平时受社会的希望，和群众的尊誉，一旦投身社会，总要有莫大的影响，满足大家的希望，发展民族的真精神才是。大家看看以前罗马的“少年义大利党”，和突厥的“青年土耳基党”，他们的精神和事业怎样？我们中国青年，以前对于国家的事，还是保守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古训。他的精神，从没有积极的表现，所以社会上对于他，还是作一个未来无限希望的思想。自从有了这回运动奔走救济，奋斗牺牲，我可以断言说是全国少年精神的一个总表现。也是社会上以前所希望未决的一个总报告。他的影响，他的效果，我虽不敢作不适意的批评，但是对于社会的希望，群众的要求，和自身的抱负究竟能否满足，所牺牲的究竟是否快意，我想参预过这回运动诸君，一经回想定有无限的感伤，无穷的失望，咳！这些话且都慢讲，五四运动既是打倒军阀，反抗强权，为人类求自由幸福，现在想贯彻这种主张，从根本上解决，就应该有几种觉悟：

## （一）对于社会上的觉悟

想解决现在社会上种种纠纷，在黑漆漆的中国里边，自然是非去脱军阀，实行平民政治不可。但是军阀政阀怎样方能尽去？平民政治如何才可以实行？这种问题，若是专拿对待曹章陆或政治革命的手段去干，勿论今日曹章陆去，明天王徐段来，就是把这些败类同时一齐推翻，那一般人民没有自动的能力识见，也就不免要被野心家利用。结果总是八两半斤，于平民政治的实现没有丝毫效益。大家看看辛亥革命哪！他不是专注意于几个败类，和共和帝制的名词，没有从根本上去做吗？所以一两个败类虽去，无限的败类复来，弄到现在，还是没点儿办法。我们青年，现在要想解决纠纷，要用双管齐下的办法，一方面拿对付曹、章的手段对付军阀，一方面下层社会，奋力进行。进行的方法数种——

（A）加入劳动阶级的活动。我所说的劳动阶级，是指着工农和一般用体力的劳动者而言。大家看看现在的世界，是工人的世界，是农夫的世界，是劳动家的世界。什么劳农政府，工党内阁，闹得翻天仆地。但是我们中国的劳农，还是蠢蠢的守着“出粟米麻丝作器皿……以事其上”的梦话，没有自动的知识，真正的觉悟就是一时有什么动作，也是被人驱使，或感情的冲动，这种动作，对于社会上的根本改造，是没有效益的。我们青年，现在要想使他有觉悟，能自动，晓得劳工的地位和价值，只有和他们打在一片，灌输他们的知识使他们有组织，有办法，成无数个精密完善的团体。一面我们做那劳动的生活，改善那班骗文凭，做高等流氓，寄生虫的先生们旧习惯。这是智识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大联合，是民众活动和民众政治实行的第一步，是打倒军阀政阀，解除社会上种种纠纷的根本办法。

（B）改善商团的组织。现在的商团，我可以断言说，多半是官僚的化身，是恶政府的机械，是一种贵族式的团体。你看他里面的会长和董事，不是满清时代的县太爷候补道，就多半是些三四等的嘉禾文虎章。那些小商人和一般学徒们，虽然也是他们团体的一分子，但是他们只有义务，没有多少权利，只有服从听命，没有能够建议主张。（著者假中和几处商团接洽，看见都是如此，其中尤以北京为最）像这种领袖制度的团体，官僚式的组织，在二十世纪的社会里边，还有存在的余地吗？我们既要改造社会，推倒军阀政阀，所以和那些军阀政阀同臭味的商团领袖，也是应该推倒的。那些崇拜领袖制度的组织，也是应当改善的。改善的方法，不外加入他们团体，使普通的商人和学徒，自动的改造。剔去官僚领袖，实行平民商人的精神和社会上普通的利益。

（C）实行民众的大联合。商团改善，工人及劳动家都有完备的组织，各村庄有组织，各市镇及各省县都有同样的组织，由小组织彼此合拢起来，成一个民众联合的大团体，处分我们分内一切的事，求人类的幸福，去社会的恶魔。只要大家有牺牲奋斗的决心，还怕他什么军阀政阀，又那有强权武力存在的余地呢？

## （二）对于国际上的觉悟

口头上的公理正义和平，只要三岁的小孩子，他晓得叫爷爷吗吗，都是不会相信的，这自然是不用再说。但是几位政治家法螺家和几个野心家所手创的国际联盟（TheLeagueofnations），他的效果究竟怎样？我仿佛记得那个条约里面，有什么国际仲裁机关，处置国际间侵占及不平等的事。山东的问题，关于我们自身，我权且只作他是侵占得狠公平，狠有道理，我也不拿尼古拉所发起的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和合众国所提议的第二次

万国和平会议去比他，扫了他们一团高兴，我且只问他，对于富姆问题，那最高法庭，究竟如何处置？唉！一个强盗生心，多少可怜虫毕命。还要说和平哪，公理哟，处置侵占不平等哪，我不知道世间不平等的事，是谁造出来的？我说到这些，我有无限的感慨，我觉得我们今后应该有真正的觉悟，来反对下列两种不祥的东西——

（1）侵掠主义

（2）秘密外交

侵掠主义是人类的蟊贼，是扰乱社会安宁的病根，我且不说被侵掠者的痛苦，就是那侵掠者的自身，除了几个渠魁巨酋称功受赏外，那些群众，还不是白白的受了一阵惊慌，冤冤的丢掉几条性命，于他有何益处？那秘密外交的祸害，也和侵掠主义一样，我且不必泛讲，只拿这回山东的问题做个例，若是没有伦敦的秘约，英、法的判断，也不至那样的糊涂。若是没有中日间种种秘约（这些秘约是强迫的，没有效，不过我拿来做个例），那小鬼虽然素抱侵掠主义，我想总不敢以现在这般骄横。简单说来，我们中国这三十年来，弄得颠颠倒倒不死不活，就是这两种东西作的祸祟。这也不止中国，大概世界上和我同调的人，总还不少。我们既立定主义，去掉这两种东西，为人类求幸福。那进行的方法，也有两种，（a）联络朝鲜及东方的各民族，打倒东方德意志的侵掠主义。（b）与各国劳动及下层社会各团体联络，反对秘密外交。这是世界和平的根本问题，是人类安宁幸福的一个大问题，这两种问题不解决，我们也莫谈什么和平人道，简直去上战场，再替老爷们放大炮捐躯壳去。

## （三）对于个人本身上的觉悟

我上来所述的两种觉悟，几种进行，算来总算是稍须急切可用，但是我想总不及个人自觉的要紧。现在我们同志，对于这回运动，究竟有何种觉悟？对于社会上种种问题，究竟想应该怎样解决？狂奴欺主，白昼杀人，民贼帝妖，弥漫全国。对于这种社会，应该怎样处置？积极的说非将他一齐推翻，实现俄罗斯式的社会运动不可。天下事不破坏不建设，这种主张，固然是求时良法，但是只注意于政治上的革新，不向下层社会奋力进行，他的坏处，我上篇既已稍谈，现亦不必多讲。消极的说，经过这回运动，大家知道学识不足，不能救亡，以后只有闭户读书，拿学术来报国。学术是事业的根本，没有学识，固然是不能做事，但是“闭户潜修”“埋头窗下”的学术，是今后社会上所需要的与否，恐怕这也要生点问题。这两种觉悟，我以为都不是解决现在社会纠纷的根本觉悟。我以为今后的青年，当有毅勇坚强之志气，对于社会上学术上，并力进行，发展东方民族的少年精神，与世界少年，携手共享自由幸福。他进行的方法，也只有两种——

（a）牺牲。牺牲是人类求幸福的手段，在黑暗空气里边，没有牺牲就没有幸福，我上面既已详说。看看这回运动，大家所牺牲的，也不为不大，然而还是没有多少效果。我想看官定要怀疑说：我这“牺牲”的主张，也不是根本的办法。唉！看官！你知道以前的牺牲，还是感情冲动的牺牲，所以社会上没收到多少的代价，我们现在的牺牲，要有方法，有目的，有真效果。有真效果的牺牲怎样？——

（1）牺牲家庭。中国的家庭，是万恶的根本，无论什么慷慨好义的人，他一入了家庭的圈套，把以前所抱负的主义和事业，十分的就要去掉八九。天天只够打坏主意“弄钱”，“谋事”，拿来替太太小姐们开心。你看那些卖国贼，他何尝是天生的卖国性根，他起初那不是想做个仁人义士。只因为他们的姨太太小姐们太多，又想供他们“千世以至万世”的家庭挥霍，“两利相权取其重”，所以只有卖国的一个法子。我们青年既想铲除万恶，所以说牺牲家庭，情愿做社会上一个好人，莫做家庭中一个奴隶。

（2）牺牲权利。据说起来，有了义务，就有权利，那权利是由义务生出来的，能够牺牲权利的人，恐怕又不能负什么责任。这话固然不错，但是你看看中国近年以来，这般纷扰不安宁，为的什么？无非是这权利两字在那里作祸祟。我们新时代的青年，既要铲除种种恶魔，所以对于这根本坏事的权利二字，要能牺牲。

（b）奋斗。今后青年的奋斗，是要双管齐下的进行，一方面对于事业，一方面对于学识，至死不变，百折不回。这是我们少年的精神，这是中华民国的一点希望。

我们青年的同志呵！时候不早了！前途的光明和黑暗，悲观和乐观，是在我们自己身上。你忍看那世界永久黑沉沉的！社会阴惨惨的！强盗们磨刀霍霍的！苦百姓战兢恐惧求死不得的！你还是空空的一场瞎闹？还是有最大的不得已呢？

# 过了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后的感慨

陈剑脩

自民国八年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闹的什么纪念日也太多。尤以五月内为最多，除了“五一”劳动节含有国际公共的性质之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关乎我中华民族倒霉的所谓国耻纪念，一般人听惯了，也麻木不灵，似乎忘记了纪念的价值和意义。不意今年“五四运动纪念”来得更突兀！上海各文化团体定于是日开会纪念，竟引起军警和捕房干涉，不得已展缓至第二日借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之光，补行纪念仪式。这诚然使人发生一大感慨！从性质上讲“五四”和五月其它各国耻纪念有点不同：固然同是一种政治运动，同是要求恢复民权和民族解放，而“五四”系以知识分子——受教育的青年——做中心，不是强拉普通民众做喊呐队；且“五四”从文艺的思想的革命开端，因时势环境的胁迫，激成生直接影响的政治行动，决非单纯的爱国运动可比。在政治不进步的国家如中国，学生引导这种运动，博得全国民众，尤其是工商界的热烈同情，不惜罢工罢市牺牲，以共赴目的，正是代表一种纯洁义愤的爱国精神，谁不叹为差慰人意呢？

但是政府和社会尽管容忍学生这种政治运动，以为不可厚非；我们实际参与过这种运动的人，今后回想，应该有深切的觉悟。或者估计它给与我国近十五年来（即民八以后）学术文化的效果不大多，而且不优良，也应该大家同声忏悔！

五四运动比较显而易见的效果，是在青年学生思想解放上，如春雷霹雳，生了一种绝大的推动力。当时北大的师生提倡发表思想的工具——文字——应该改革，并且从事于介绍西洋新思想及新道德观念，也给青年学生的人生观不少的影响。所以这次运动纵横奔赴，一发而成功。有人喻之为欧洲的“文艺复兴”，洵非过誉。其次一等的效果，毋容讳言是在政治方面。本来学生过问国家大事，在近代各国早有先例，毫不足怪。未统一前的意大利革命运动，德意志的国民统一运动，都有青年学生的热烈参与；一九一七年以前之俄国大学生常为攻击政府的先驱，近几年来的南美学生干涉政治，也常有所闻。何独我国为然？我国辛亥以前之革命运动及辛亥革命的空前成绩，大半是海内外学生奔走呼号后才有的。不说别的，黄花岗七十二先烈及挺身行刺的徐锡麟、唐才常诸先烈，那一个不是优秀富有希望的青年学生？又何自“五四”始？不过民八时代的北洋政府，为军阀官僚的大集团，昏庸，贪墨，黑暗，一天比一天厉害，只有学生是比较觉悟的有组织的份子，集合接触的机会很多，容易发生共同的行动。他们具有政治意识，所以不满意当时旧势力盘据的政治状况，不惜牺牲神圣的学业，用全力引导民众去企图推翻它。破天荒的五四运动于是乎轰然大爆发了。随后这幕全武行遂成为历史上重演的事实。民九二月学生界有因山东问题游行大示威，主张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民十四三月有拥护总理所召集之国民会议运动，同年全国学生以五卅惨案出而鼓吹激烈反抗帝国主义运动以及反基督教同盟，又有因日本戮杀长沙市民的六一惨案，英国炮击沙基市民的六二九惨案，继续不断地羣起反攻。次后民十四冬北京有所谓首都革命，民十五春有三一八惨杀学生案，民十六年以后的响应援助北伐军和积极参加种种革命活动，都足以表明青年学生运动在政治方面的效果。凡是都是五四运动树的基础，所由唤起青年学生的兴趣，扩充青年学生的眼光，解放青年学生的思想，影向我国政治社会的全体。

虽然，自“五四”以来我们总觉得学生对于国家社会“干了的那么少，要干的那么多；”尤其是对于学术科学方面的。中国近二十年来提倡科学的呼声日高，初只顾到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的输入，（如杜威、罗素诸士之来华讲演）渐及于推行科学教育之方法（如推士氏来华到处视察与讨论），到最近几年才感觉到提倡研究之必要。在各大学设立研究讲座，研究所，在京、沪、平设立国立研究院，有些部分曾有优良的工作成绩报告出来，的确是一种好现象。民国十六年中央的教育行政机关（当时叫做大学院）并提倡“行政学术化”创

立大学区制，至今各地方还有“救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教育机关学术化”等口号。然而有些人，或者出于 inferiorityComplex 的心理，竟有咀咒教育学术机关是无异于衙署招待所一类的东西，可以变成一群无业游民嗷饭之地，简直把“行政学术化”适得其反“学术行政化”了。仪器标本书籍虽然购买得差不多，可是研究的目标，轻重先后缓急不大规定，犹之乎目前各大学的课程一样，谁当教授，有什么愿教的 Course，谁就可以 Offer。有几种科学，在外国已有相当结果，早已不太当时，而中国正在着手；有几种科学，外国人觉得不重要不再努力，偏有中国人“像煞有介事”起劲在干。最可怪的莫如掘地洞寻考古董，尤莫如匪情极严重的省分提倡音乐教育的研究；自今日观之，实在不知“贤者之用心何在？”科学的研究工作固然是尝试的，但也是有计划的，不应当缺乏标准和意义。关乎专门人材一层，正如我的一位朋友说的“国内具虚名无真本领的科学家太多”，眼高手低，日日提议科学化运动，只怕不容易给中国学术上多少真实的贡献。现在国内学术方在萌芽，很少有人肯死心踏地做那榨干了的甘蔗一般的研究，就缩小一点说，现在正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甚至对于一种实验也很少有肯把它照同一方法与手续重做一遍，以校正他人的结果。这样，中国的科学，纵为一辈青年所注意，也不一定会有惊人的发展呵！回顾我们实际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为何如！我在早两天沪报上读到蔡孑民先生在上海各文化团体所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会的演讲，有几句话说“自五月四日至七月廿三日八十日之奋斗，感觉环境之善变与应付之困难，悟学力不足者不足以应变，而勉学之精神为之增进，所以五四运动中最出力的，于运动告一段落后无不力学，多有毕业大学以后赴外国留学更求深造，至今成为著名学者的”，这固然是事实，但所成就的太半是政论家文哲批评家的和国民革命进程中的哼哈大将，其在学术文化，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可说是可怜得很！我们回念到这里不由得不感慨！上周“五四”那早晨，我刚到中大科学馆授课，便看见致知堂门首悬一幅横布大标语“我们要一致步武五四运动的后尘”，倘若他们“幸而言中”，其效果仍不过在思想解放和政治运动而已！时间匆匆的过了十五年，我希望今日的学生运动转一个方向并多向几个方向努力。

再说“五四”的效果影响到社会或民众方面。有人以为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在当时感于工商界的热诚援助，而悟及普通常识之需要，每于学校课余，办校役教育及平民学校，一方面促进语体文的发展；总想在这积极事业上尽一分力。蔡先生尤深刻感觉此点，我记得他于当年八月中旬复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函，有下列一段：

“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矣，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其言教育也，始而专门技术，继而普通学校，最后乃始知纯粹科学之必要。吾国人口号四万万，当此教育万能，科学万能时代，得受普通教育者百分之几，得受纯粹科学教育者万分之几。诸君以环境之适宜，而有受教育之机会，所以对吾国新文化之基础，而参加于世界学术之林者皆有将有赖于诸君。诸君之责任，何等重大！今乃参加大多数国民政治运动之故而绝对牺牲之乎？抑诸君或以唤醒同胞之任务，尚未可认为完成，不能不再为若干日之经营，此亦非无理由。然以仆所观察，一时之唤醒，技止此矣，无可复加。今若为永久唤醒则非有以扩充其知识，高尚其志趣，纯洁其品性，必难幸致。自大学之平民讲演，夜班教授，以至于小学之童子军，及其他学生界种种对于社会之服务，固常为一般国民之知识，若志趣，若品性，各有所适用矣。苟能应机扩充，持久不怠，影响所及，未可限量。……”

蔡先生的意思，大概在劝勉学生注重学业的研究，品行的修养，以次及于社会服务。我上面断章取句的引一段，无非是欲证明“五四”对于社会事业方面有无效果及有多少效果？我们试一反省，今日民众教育有些地方虽然略具成效，但是社会事业多半废而未举，岂不是参加五四运动的人学养不足服务不力吗？蔡先生说的话常常被人引作信仰的；我希望他今后能够本“五四”时之精神以正确思想在大道上引导青年学生。上周“五四”之夕，南京北大毕业同学会举行聚餐会，罗志希先生曾演说北大有三种精神（一）博大的精神（二）创造的精神（三）奋斗的精神，其影响五四运动亦如是，发挥和夸耀得很详。这话当然是不错，只是我个人觉得“博大”若至于“兼容并包”“圆通广大”，反使思想主张纷繁，无论做事与治学，都有最大不过的流弊；“创造”“奋斗”而无正确方向与途径，更显出乱杂的现象来。今日中国社会弄得纷繁杂乱一团糟，或是受了负方面的“五四”影响吧！五四运动本来代表一种纯洁义愤的爱国精神，意义深远，值得永久纪念，但于一年一度纪念时终竟不免有一番感慨！

# 赵家楼回忆记

潘　菽

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北平学生“大闹”赵家楼这段故事已成为民国历史上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大家所晓得的，我也曾躬逢其盛。现在把所还记得的在当日的个人经历记下来，作为许多五四掌故的一点补充。

在五四那一天的下午，北大学生吃过了饭便整队出发游行，当时并没有受到什么阻碍。在路上，其他学校的队伍也陆续汇合加入，确实成了浩浩荡荡之势。一路上大家不断地高声呼喊的不外乎“打倒卖国贼某某”之类。这种几千人一致高声的呼喊似乎使整个北平城都起了漫天的回声。我还是初次参加这种事情。夹杂在队伍里，每一次听到这样的一声愤怒的呼喊，我的全身神经便很厉害的震动一次，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向胸口涌上来，连耳朵和面颊也觉得发热。

整个队伍到了天安门前面的旷场上，停留下来开了一个露天大会。有好几个人登高演说。捶胸瞪目，有一个人咬破了指头写下鲜红斑烂的血书，这大都是当时的领袖们。最后有人提议到赵家楼去质问曹汝霖，因为他的家是住在那里的。当然大家赞成。于是队伍便向那里进发。

到得赵家楼，曹公馆的大门已紧紧闭上，许多人站在门前无法可想，也不知道这屋子里的主人究竟在家否。当时的秩序很好，至少并没有撞门撬户的事情。那大门的旁边是一个房间，有一个向街开的高窗子，像许多北平人家通行的形式。可是那个窗子并不太高。当大家正在莫可如何的时候，一个奋勇的学生似乎看到了打破僵局的办法。于是他从那窗子口爬进去，把大门从里面打开。大门既打开，一部分人就蜂涌而入。但大部分的人仍留在街上，并且大半的队伍还在后面没有到。

经过了好几分钟之后，原来留在外面的一部分人也走进去看看。我也于此时跟了进去。只见院子里已被打得相当凌乱，有几个人还继续在打毁器物。在旁边另外一个院子里，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像站不住的样子，由其他一个人扶着。据说那站立不住的人是章宗祥，已被打了一顿，但看来打得并不重，毫无伤痕，至多不过吃几拳而已。不过在一个柔肌软骨的人吃了几拳，就站立不住也是无足怪的。那个扶着他的人据说是一个日本人。这个日本人并未被打，可见当时最激昂的份子也并没有失去了自制能力。

现在想起来，曹府上屋子内部的情形我一点也没有印象，大概当时完全没有注意向这方面看一看。这所宅子并不怎样阔大，但颇为曲折，略有花木之胜。在里面没有遇见一个女人，小孩子，或佣仆之类，大概都已躲开了。

在里面不久就听到外面传来一个消息，说有大队的兵要来了。于是许多人便开始离开那宅子。走出门一看，原来的许多人也大都不见了。此时我就只得不管原来的学校队伍而单独行动，胡乱向着一条胡同走去。还没有走到半个胡同，就听到后面说，开来的兵预备要开枪了。人到此时，两只脚就很自然地动得快起来，我又岂能例外。可是等我一慌张，横肚里就马上来了一拳，把我击倒在地上，然后赶快的把我的两只手向背上一折，用一条粗粗的麻绳捆绑了起来，同时还喝着说“你干的好事！”这对于我倒很是突兀，从来没有尝过这种滋味。那个捆绑我的人穿着普通的衣服，看起来完全是一个“寻常行路人”，于是我才第一次恍然大悟：世界上的虎狼亦有蒙着羊皮者。

其实在我前后走着的同学仍有好几个，不过他们都比较老练或乖觉，并未露出慌张的样子，有的甚至故意走到路旁小铺子买点东西，以避暂时的风头。所以他们都得免于捆绑之难。只有像我这种澈骨老实人才遭了殃。这一点在现在更可以证明。因为后来得法的人在当时没有一个曾被抓住，而在当时被抓住的后来没有一个“有办法”，就像我现在一样。

因为上面的理由，在当时被抓了起来的人并不多，一共不过七八十来个人，我已记不清确数了。我们这几个受重重捆缚的人汇齐了以后，便解到附近的一个大概是卫戍兵支队所驻在的地方去。这倒一点不像衙门，完全是破落户的样子。中间是一个相当大的院子，旁边有几间不象样的房子。先把我们拢在院子中间，排成一排，仍捆绑着。在我们旁边和前面是三支一架的许多架枪和褴褛样子的灰衣兵。那时已近傍晚，后来天色渐渐黑下来了。于是他们把我们押进这院子的角落的一个土牢里去。这牢房是一间很矮小的土房子，只有一个门，没有其他可以透进空气和亮光的地方。靠着这房子的两边是

一个曲尺形的土炕。从这土炕的边缘一直上达房顶是用很粗的木头做成的棚栏，把棚栏门一开，便把我们一个一个推了进去。原来那土炕上垫的是芦席，但已破了。在这人笼子里面已有好几个蓬头垢面，态度飒缩的朋友在那里，或者已在那里好几年了也未可知。他们起初看见我们这一群人进去似乎很为惊讶，但都不敢响一声。我们也没有心绪和他们攀谈。大家只是面面相觑。这人笼子里的臭虫跳蚤和白虫一定不会少，但我们当时还没有十分觉得。然而尿臊臭和汗垢臭是显然很触鼻的。这在牢狱中也显然是最坏的一级。

我们当时都默自地想，竟然受到这样的处置，大概很严重吧。后来听说那时的当局的确很有人主张非严办不可。所谓严办者当然就是杀气腾腾的意思。不能杀牛的人偏有杀鸡的威风。所以这也并不能算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据说唯独有徐世昌极力主张不可胡作乱为，才把事态缓和了下来。假定当时真的落在一个不管别人死活，只知替自己邀功讨赏的混蛋家伙手里，那末区区之身亦许早已被埋葬在北平城里或西山的什么地方，在前面树立一块石碑，题曰“某某烈士之墓”了。荣誉亦有于无意中得之者，这是很可能的。不过我假如做了鬼魂，也要感觉得惭愧无尽。真正的烈士们却变成不烈士，毫无烈士资格的人却变成了烈士，这算什么话呢！然而历史的捉弄人往往如此。

大概就是因为徐世昌的主意得到胜利吧，我们在当晚的十点多钟光景就被移送到警察厅去。到了那里以后，随即开了一庭。情形却显得缓和多了。每个人不过略略的问了几句。当问到我时，那个坐在上面的审判官脸上现出轻视的微笑。他似乎在说，“像你这样的一个未知世故的孩子那能闹什么事，一定是上了别人的当了。”他的前半段想法当然是对的，但后半段想法，假如他真的这样想，却完全落了空。因为我根本没有受什么人的指使而做了什么不应该的事。他亦许自以为很聪明，一看就看穿了实情。其实他的聪明总还差了一层。他看我们这几个孩子应该惊异而深思。他应该这样想：“连这样的孩子也激动了起来，那末一定是天怒人怨，总有什么不对的了。”他不能如此想，才会露出那微笑。所以人的微笑有时不过是蠢笑而已。

我们大家经过了审问以后，便被送到一所两三间开阔而形似会客厅的屋子里去。那里有木制的炕床给我们睡觉。到了明天，外面就有人来送糖果茶食之类来“慰劳”我们，但并不多。我们除了不能离开那院子以外，也就没有其他的限制。据传进来的消息知道上海已罢市，各地都响应起来。我们已明了，不会再有意外的事情落到头上来，所以大家的心头已没有什么挂虑，至多不过预备在那客厅里多闲住几天就是了。我的记忆力很差，当时的“同难”朋友的姓名现在竟一个也想不起来了。

这样过了个把星期，有一天早晨忽然外面传话进来说，我们可以被释放了，各学校将有代表来接领我们。不多时，各学校的代表果然都来了。北大的代表是方豪同学。在临行之前，那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还亲自出来向我们说一番好话——现在所谓训话，但那时还没有这种名词。他是一个白白胖胖的人，仪表颇好。他穿了一身和街上警察所穿同样式子的黑色衣服，不过料子是好的呢料，并且袖口和领边都镶有很宽的金线，表示他是高级的大员。我当时在心中又产生了一种幼雅的未经世面的想头，觉得警察头儿亦有算是大官者。因为在民国初年，开始推行警察制度于各地，我的一个表兄就去了警界。我的外婆对此事最不满意。她常对人说，“当警察的人都不知道羞耻，一天到晚站在街头成什么样子！”所以我最初对于警察二字所得的联想是颇坏的。现在却把这种幼雅的联想应用到堂堂的总监的身上去了。

回到学校，先到沙滩的文科大楼。在大楼后面的空场上已有很多同学在等着我们。第一个跑出来迎接我们的是罗家伦同学。他热烈的拉着我的手。我明明记得，他当时一边说话，一边掉下了泪来。但我的心中却只是木木然。因为我始终觉得，这番的事情是和我无关的。当天的下午或是过一天的早晨，那时的高等师范学校有一位姓瞿的代表还亲自跑到我的宿舍房间里来很恳挚地向我慰问。我除了感谢之外，心中也同样只是木木然。后来的瞿秋白据说就是他。

五四那天的事情经过报纸记载的煊染，格外像是轰轰烈烈。后来知道，我的父亲从上海报纸上得到这个消息并且看见在被捕的人中有我的名字，着急得几天不能安睡。我回校以后，看到他已来一个电报询问究竟，并嘱我及早返南。我在覆他的家禀中，极力说明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事，我也并没有什么激昂的举动。记得在那信中有几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被捕并非是为了领头而是为了落后，只感觉得十分惭愧耳。写在家禀中的话当然是不折不扣的真实话。后来我也很少向人提起这事。

到了暑假，我也就取海道而南归了。

卅一年夏，于松林坡

# 北京分社早期社员名录（三）

| 姓名 | 性别 | 年龄 | 籍贯 | 服务机构 | 住址 | 社内职务 | 备考 |
|---|---|---|---|---|---|---|---|
| 黄子卿 | 男 | 53 | 广东 | 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 | 北京大学南大地 52 号 | | 53 年 9 月 29 日第十次中常会通过 |
| 张清沔 | 男 | 33 | 松江省 | 农业部农政司宣传处编辑 | 北京市朝阳门内竹杆巷 17 号 | | 53 年 9 月 29 日第十次中常会通过 |
| 白玉荣 | 女 | 42 | 河北 | 北京女十一中高中国文教员 | 东四区马大人胡同 | | 53 年 9 月 29 日第十次中常会通过 |
| 许泽虞 | 男 | 32 | 浙江 | 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一级技术员 | 西四北前英子胡同 14 号 | | 53 年 9 月 29 日第十次中常会通过 |
| 涂友仁 | 男 | 31 | 四川 | 农业部畜牧兽医总局工程师 | 东城干面胡同西罗圈 2 号 | | 53 年 9 月 29 日第十次中常会通过 |
| 武剑西 | 男 | 56 | | 北京高等教育部教学指导司司长 | | | 53 年 10 月 19 日由武汉转来（无材料） |
| 甘智泉 | 女 | 51 | 四川 | | 北京医院宿舍一楼 | | 53 年 10 月 19 日由杭州转来，51 年 2 月 16 入社。 |
| 张昌铨 | 男 | 29 | | 北京师范大学代数数学研究班学习 | 北京师大北院（助教） | | 53 年 10 月 19 日由重庆调来，55.7 回重庆。 |
| 丁於钧 | 男 | 36 | 江苏 | 清华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 | 重庆土木建筑学院副教授 | | 53 年 10 月 21 日由重庆调来，54 年 7 月 14 日转回重庆。 |
| 王梅卿 | 女 | 32 | 江苏 | 本社干部 | | | 53 年 11 月 6 日由南京转来，54.8 调上海。 |
| 张为申 | 男 | 44 | 江苏 | 天坛生物制品所主任技师 | | | 53 年 11 月 30 日由西安调来，54 年 4 月回西安。54.7 由西安调京。 |
| 廖可兑 | 男 | 38 | 湖北 | 中央戏剧学院教研室主任 | | | 53 年 11 月 30 日由西安调来 |
| 杨周翰 | 男 | 37 | 江苏吴县 |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 北京大学中关园 25 号 | | 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次中组会通过，以下 12 人。 |
| 李继侗 | 男 | 57 | 江苏 |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兼植物教研室主任 | 燕东园 41 号楼上 | | 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次中组会通过 |
| 潘家洵 | 男 | 57 | 江苏 | 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 东大地 34 号 | | 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次中组会通过 |
| 潘絜兹 | 男 | 37 | 浙江 | 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部技术组组长 | 西单报子街甲 83 号 | | 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次中组会通过 |
| 贾芳 | 男 | 44 | 北京 | 北京图书馆阅览室参考部主任 | 西四皇城根甲 44 号 | | 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次中组会通过 |
| 陈嵘 | 男 | 66 | 浙江 | 中央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 | 北京万寿山本所 | | 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次中组会通过 |
| 王宝田 | 男 | 37 | 河北 | 中央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所森林经理系主任 | 西城半截碑 12 号 | | 53 年 12 月 16 日第 11 次中组会通过 |

| | | | | | | | |
|---|---|---|---|---|---|---|---|
| 李毓华 | 男 | 37 | 江西 | 中央林业部办公厅档案资料科副科长 | 景山东街二眼井四号 | | 53年12月16日第11次中组会通过 |
| 汪绍平 | 男 | 31 | 辽西 | 中央林业部森林工业司木材工业科技术员 | 北京东四六条 | | 53年12月16日第11次中组会通过 |
| 程裕淇 | 男 | 41 | 浙江 | 中央地质部矿产司副司长 | | | 53年12月16日第11次中组会通过 |
| 张全新 | 男 | 40 | 吉林 | 北京图书馆副馆长 | 安定门内板厂胡同7号 | | 53年12月16日第11次中组会通过 |
| 陈新谦 | 男 | 34 | 湖北 | 中国药学会药学能报副编辑 | 东四隆福寺街轿子胡同25号 | | 53年12月16日第11次中组会通过 |
| 吴本厦 | 男 | 27 | 福建 | | | | 1953年12月14日由上海调北京 |
| 骆剑冰 | 女 | 42 | 湖北 | 《剧本》编辑部 | 东四头条四号 | | 1953年12月14日由上海调来，1954.8.5转回上海。 |
| 萧前瑛 | 女 | 32 | 江苏 | 北京师大进修班 | | | 1954年1月5日由西安调来，1955.2调回西安。 |
| 程堂郭 | 男 | 29 | 安徽 | 清华物理教组进修班 | | | 54年2月8日由重庆调来，54年7月14日转回重庆。 |
| 侯德封 | 男 | 52 | | 北京地质研究所 | | | 54年2月15日调京 |
| 田凤调 | 男 | 30 | 河北 | 中央卫生部统计科科员 | | | 54年3月10日通过 |
| 冯义人 | 男 | 44 | 山东 | 人民卫生出版社编审 | | | 54年3月10日通过 |
| 王鹏 | 男 | 37 | 安徽 | 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程师 | | | 54年3月10日通过 |
| 张更 | 男 | 58 | 浙江 | 原西北石油管理局探勘处，现石油学院地质系主任 | | | 54年8月由西安调来 |
| 孙增敏 | 女 | | | 师大学习 | | | 1954年5月14日由南京调来，54.12调回南京。 |
| 岳超 | 男 | 39 | 浙江 |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办公室副主任 | 中关村物研所 | | 54.5.25通过 |
| 仇永炎 | 男 | 32 | 江苏 | 北京大学讲师 | 北大 | | 54.5.25通过 |
| 涂光涵 | 男 | 31 | 湖北 | 林业部制造林司种苗科副科长 | 北京东四 | | 54.5.25通过 |
| 贺净宇 | 男 | 42 | 河南 | 本社干事 | | | 54.5.25通过，54.6.15转青岛。54.12由青岛调回。 |
| 王永华 | 男 | 28 | 宁夏 | 地质学院进修 | | | 54.5.1由西安调京。 |
| 吴传钧 | 男 | | | 地质部 | | | 54.2自南京来，54.11调回南京 |
| 郭文魁 | 男 | | | 地研所 | | | |
| 过祖源 | 男 | 49 | 江苏 | 上下水运设计院总工程师 | 东四大方家胡同31号 | | 54.7.20自津调来 |

| | | | | | | | |
|---|---|---|---|---|---|---|---|
| 郝御风 | 男 | 44 | 抚顺 | 原西大中文系教授，北大进修 | | | 54.7.30 自西安转来，55.8 转回西安。 |
| 汪鸿鼎 | 男 | 40 | 江苏 | 人民大学经济研究室进修 | | | 54.9.6 自上海转来，55.7.7 转上海。 |
| 黄汲清 | 男 | 50 | 四川 | 地质部普查委员会常务委员 | 西郊百万庄，西郊三里河地质部宿舍 111 号 | | 54.8.30 通过 |
| 杨崇瑞 | 女 | 62 | 河北 | 中央卫生部妇幼卫生局局长 | 东单黄兽医胡同 15 号 | | 54.8.30 通过 |
| 傅鲁 | 男 | 54 | 吉林 | 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 | 东城铁狮子胡同 3 号 | | 54.8.30 通过 |
| 黄文锽 | 男 | 35 | 福建 | 水利学院教授，调清华大学水力教研室 | 平斋 687 号 | | 54.9.20 南京调来，55.6.10 调南京 |
| 王士哲 | 男 | 28 | 陕西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编辑室 | 端王府夹道人教出版社宿舍 27 号 | | 54.9.19 调来 |
| 柳大纲 | 男 | | | 中国科学院秘书处 | | | 54.9.9 调来 |
| 黄惠荣 | 男 | 33 | 四川 | 重庆大学机械系副教授，调清华大学机械制造系金属切削教研室 | | | 54.9.27 调来，55.7.27 回重庆 |
| 萧长富 | 男 | | | 矿冶学院短期进修 | | | 54.10.8 重庆调来，55.7.4 回重庆 |
| 刘遂生 | 男 | | | 人民教育出版社 | | | 54.10.8 上海调来 |
| 陈乃昌 | 男 | | | 民建中央工商研究处副处长 | | | 54.10.13 上海调来 |
| 何全茂 | 男 | 29 | 广东 | 清华大学进修 | | | 54.10.25 上海调来，55.7.29 回上海 |
| 易齐正 | 男 | 31 | 湖南 | 北京建筑事务管理局工程师 | | | 54.11.5 通过 |
| 栗存孝 | 男 | 32 | 北京 | 北京市人民政府建筑事务管理局工程师 | | | 54.11.5 通过 |
| 郝丰菴 | 男 | 50 | 河南 | 水利部灌溉管理局技术专员兼工务科员 | | | 54.11.6 自重庆调来 |
| 龚志坚 | 男 | 46 | 四川 | 卫生部中医司科长 | | | 54.11.6 自重庆调来 |
| 张禄荣 | 男 | | | 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局 | | | 54.11.12 自重庆调来，55.3.29 调兰州 |
| 李叔达 | 男 | | | 地质学院进修 | | | 54.11.12 自重庆调来，55.7.19 回重庆 |
| 张兴富 | 男 | 36 | 四川 | 国家计划委员会 | | | 54.12 自重庆调来 |
| 张查理 | 男 | | | 卫生部卫生研究院兼医药学会秘书长 | | | 54.11 自西安调来 |
| 顾执中 | 男 | 56 | 上海 | 高教出版社 | | | 54.12 自上海调来 |
| 董大酉 | 男 | 54 | 浙江 | 中央建筑部城市建设局直属公用建筑设计院 | | | 54.12 自西安调来 |

| | | | | | | | |
|---|---|---|---|---|---|---|---|
| 王业俊 | 男 | 45 | 黄陂 | 北京建筑工程部设计总局给水排水设计院 | | | 1953 年入社。54.12 自上海调来。60.7 又由成都转京。 |
| 朱传秀 | 女 | 28 | 安徽 | 北京师大进修班 | | | 55.2 重庆调来，55.8.23 转回 |
| 张德亮 | 男 | 28 | 平原 | 国家劳动部劳保训练班学习 | | | 55.1.2 重庆调来，55.8.23 转回 |
| 罗蛰潭 | 男 | | | 北京石油学院 | | | 55.1.2 重庆调来 |
| 葛绥成 | 男 | | | 新华地图出版社 | | | 54.12 沪调来 |
| 金肇宇 | 男 | | | 新华地图出版社 | | | 54.12 沪调来 |
| 梅若兰 | 女 | | | 师大物理系进修 | | | 55.1 南京调来，56.8.3 转南京。 |
| 谭其骧 | 男 | | | 资治通鉴标点委员会 | | | 55.2 沪调来 |
| 范胜兰 | 女 | | | | | | 55.4 沈阳调来，56 年 4 月 19 日调沈阳。 |
| 张同和 | 男 | | | 同仁医院进修 | | | 55.4 西安转来 |
| 王增润 | 男 | 57 | 北京 | 国务院法制局编译 | 大鸦宝胡同 | | 55.4.25 通过 |
| 张庚戌 | 男 | 42 | 河南 | 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监察室监察员 | 宣外校场小六条康尔里 13 楼 16 号 | | 55.4.25 通过 |
| 储天任 | 男 | 57 | 江苏 | 中央卫生部卫生科学研究委员会处长 | | | 55.4.25 通过 |
| 戴盛甫 | 男 | | | | | | 55.4.20 自西安调来。 |
| 胡士毅 | 男 | 33 | 四川 | 北京邮电学院 | | | 55.7.25 由重庆调来。 |
| 李道维 | 男 | | | 第二机械工业部 | | | 55.3.29 自湖南调来，55.5.5 调南京。 |
| 蒋程九 | 男 | 53 | 山东 | 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教授 | | | 55.8.5 自重庆分社转来 |
| 陈策骐 | 男 | 55 | 福建 | 邮电学院无线电系副主任 | | | 55.8.27 自重庆分社转来 |
| 郭翼舟 | 男 | 50 | 江苏 |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 | | | 55.9.1 苏州转来 |
| 胡筠 | 男 | 40 | 江苏 | 邮电学院 | | | 55.9 自天津转来 |
| 陈厚堪 | 男 | 47 | 江西 | 邮电学院 | | | 55.9 自天津转来 |
| 杨恩泽 | 男 | 25 | 广东 | 邮电学院 | | | 55.9 自天津转来。党员。 |
| 卢鹤绂 | 男 | 39 | 山东 | 北京大学工作 | 中关园 | | 55.12 自上海调来 |
| 孙国桢 | 男 | 37 | 吴县 | 市政工程设计院工程师 | | | 55.9.16 日通过 |
| 王孝祥 | 男 | 31 | 浙江 | 清华大学进修 | | | 55.9 自重庆调来 |
| 钟焕邦 | 男 | 44 | 江西 | 北京大学化学系进修 | | | 55.9 自长春调来 |
| 张兴英 | 男 | 33 | 湖南 | 北京第二机械工业部 | | | 55.9 自长春调来 |

未完待续

# 九三社员推动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的历程及研究

周国民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而没有遗体，就没有解剖。然而，由于历史和传统的原因，我国遗体捐献工作起步晚、阻力大、发展慢。上海市遗体捐献工作自1982年在我国大陆率先开展，并于2001年3月1日颁布实施了第一部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截至2015年底，上海遗体捐献登记累计已达41170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实现捐献累计8770人，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二，成为了全国遗体捐献工作的领头羊。回顾历史，在遗体捐献工作的推动、立法和率先垂范方面，上海九三社员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 医学泰斗，捐遗先驱

在我国近代医学史上，颜福庆（1882－1970）是一位享誉中外的医学泰斗：他是耶鲁大学第一位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亚洲人，是著名医学教育家、公共卫生学家、国家一级教授；他先后创办了湘雅医学院、中华医学会、上海医学院、上海肺科医院、中山医院等医学教育和医疗机构，为我国医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实，颜老不仅是一位医学泰斗，也是一位遗体捐献的先驱。他深知遗体对医学教育与研究的重要性，早在湘雅医学院担任院长的时候，就做了一件开先河的事情。

1920年10月6日，在《大公报》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由湘雅医学院运来女尸首一具，请朱医士临场讲解。”一场惊世骇俗的人体解剖公开课，如期在长沙楚怡学校“菊花会”上进行，在长沙市民中引起了轰动。“菊花会”是当地举行的一场赈灾义卖活动。颜老将此当成科学普及的阵地，在向观众揭开人体解剖的神秘面纱的同时，也宣扬了解剖对于医学的重要性。

2014年3月12日，颜老的孙子——颜志渊老师来到上海医学院人体科学馆，因此向我们揭开了一段已尘封70多年的历史往事。据颜老师回忆，在他10来岁的时候，爷爷曾带他参观解剖陈列室，并指着一个标本瓶中的双胞胎女孩深情地说：“这是你的亲姐姐……”原来颜老师的母亲于1944年怀了一对双胞女胎，但不幸早产夭折。颜老为了医学事业的发展，怀着沉重的心情，毅然决然地将夭折的双胞胎孙女捐到了由他创办的医学院的解剖室，保存至今。这珍藏的不仅仅是一件标本，更是颜老精神的最好见证与诠释。

早在1960年，颜老便嘱咐亲属：去世后将遗体提供给学校作解剖之用。然而，由于颜老在文革中深受迫害，不幸于1970年11月29日在家中含冤去世，一位医学巨匠就此陨落。因为身背了“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颜老捐献遗体的愿望最终没有实现，无不让人扼腕叹惜……

颜老于1956年3月加入九三学社，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上海分社副主任委员。在他的登高一呼和热诚感召下，谷镜汧、荣独山和林飞卿夫妇、苏德隆、郭秉宽、倪葆春和王淑贞夫妇、董承琅、顾绥岳及戴天右等一大批名医纷纷加入九三学社。1957年，医务界的九三社员就从原来的7人发展到81人，分布在全市22个医务单位。这些九三先贤们，在以后不同时期都为推动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由此可见，颜教授不仅是医学界的泰斗，也是九三社员开创遗体捐献的先驱，他毕生提倡捐献遗体，并身体力行。

## 病解大师，率先垂范

众所周知，病理解剖在最终明确疾病诊断和寻求病因上有绝对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病理解剖还是病理学教学的核心内容和知识来源。谷镜汧教授（1896～1968）是我国现代病理学奠基人之一、著名病理学家、医学教育家、国家一级教授。他于1925年在德国获医学博士学位，1926年回国受聘于北京协和医学院，1927年随颜福庆到上海创办上海医学院。

谷老通过大量的尸体剖检发现了医学上的很多未

知数，这些发现的未知数提高了临床诊断的正确率，提供了治疗疾病的有效方法，为此他极力倡导尸体解剖。1950年，他在《大众医学》、《中华病理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发起签名运动，促进知名的科学家、社会名流加入遗体捐献志愿者行列。作为九三社员，他还在上海市政协会议上多次发言，介绍开展病理解剖工作的重要意义，得到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及临床医生的协作，使尸检工作得到很大的发展，为临床、教学、科研积累了大量宝贵的资料，提供了珍贵的病理标本，并在上海医学院建立了国内规模庞大、病种齐全的病理标本陈列室。

1955年3月14日，谷老亲笔写下了解剖志愿书："本人是一个病理学工作者，深知病理解剖之重要，而又鉴于我国病理解剖之缺少，故愿将自己的身后遗体贡献于医学院作为病理解剖的材料。经过病理解剖之后，并愿我的骨骼制成正常（或病理）解剖标本，希望此身之最后部分还有用处。"

令人感动的是，谷老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自己死后遗体要做解剖的诺言，叮嘱亲属将其遗体送去解剖，查找病变和病因，还殷殷嘱咐死后解剖时仔细观察他的心脏、血管、肾上腺等。他以实际行动实现了生前诺言，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祖国医学科学事业。

## 建言献策，助推立法

十年动乱，一场浩劫，遗体捐献工作也受到严重冲击。文革结束后，科学迎来了春天，医学科学也不例外。然而，遗体需求增加与遗体捐献匮乏的矛盾，严重阻碍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众多医务界的九三社员通过媒体、人大、政协等途径，积极建言献策，倡导志愿捐献遗体，促成了上海红十字会遗体接受站的成立，并助推了中国首部遗体捐献的地方法性规的诞生。

1980年12月11日，是九三学社上海第一医学院支社进行组织生活的日子。就在这次会议上，著名解剖学家、组织胚胎学家、国家二级教授、原上海市人大常委、政协委员王有琪教授（1899 — 1995）提出："1980年人大不久将开，有几个问题可以提案，将来会有答案，如尸体解剖，请简单写提案……"彼时，民主党派刚刚恢复活动不久，九三先贤们对遗体捐献工作的重视及高瞻远瞩，非常让人敬佩。

著名肺科专家、国家一级教授吴绍青教授（1895 — 1980）生前和家属、同事多次说过："遗体是不必动用国家外汇去购买的、宝贵的科技资料。与其火葬，不如献出来，为医学发展作点贡献。"1980年，他因心肌梗塞病逝，根据他的遗愿，其遗体用于医学解剖，亲友为他致哀的花圈钱捐献给医学事业，治丧委员会把葬礼费用全部捐献给防痨协会上海分会。

1981年，上海市皮肤病眼病防治所所长、九三学社社员吴厚章教授给《解放日报》写信，建议提倡尸体解剖和器官捐献，并表示愿在身后献出自己的遗体。看到报上的来信后，有35位读者来信，纷纷表示愿在身后献出遗体，为发展祖国的医学科学，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贡献出最后一份力量。来信的读者中，既有共产党员，也有包括九三社员在内的民主党派人士；既有不少年老的退休职工，也有年轻的教师和工人，他们都认为，提倡尸体解剖和器官捐献，是移风易俗的一件大好事。

1982年，著名眼科学家、国家一级教授、原九三市委常委、上海市政协委员郭秉宽教授（1904 — 1991），在市政协五届四次全体会议上提出了"关于志愿死后捐献自身遗体和眼球的创议"。郭老指出，角膜病是致盲的主要原因，角膜移植术需要把新鲜尸体的眼球储藏起来，但取得尸体眼球十分困难，使许多本来可以恢复光明的盲人得不到治救，已经建立的眼库形同虚设。为了解决角膜来源问题，他特提出志愿在死后捐献自身遗体和眼球的创议，并通过这一创议作为生前立下的遗嘱，使之合法化。郭教授希望遗体捐献能在社会上蔚然成风，这样不仅可解决医学院校尸体解剖教学材料来源，更将是广大盲人的福音，则医学教学幸甚，盲人幸甚！市政协办公厅对郭教授的提案进行了书面答复：对你的倡议我们表示完全支持和崇高敬意。自觉捐献遗体要克服旧的传统观念，要进行宣传、教育和倡导。市政协已通过报纸和政协《会讯》作了一些宣传，并转请有关部门注意这方面的宣传工作。郭老于1991年9月28日去世，其亲属将他的遗体和眼球捐献给上海医科大学，实现了郭教授生前的愿望，为医学事业贡献了一切。

上海市第四、五届政协委员，上海市科研先进工作者，上海市劳动模范，著名病理学家顾绥岳教授（1912 — 1991）也在政协积极建言献策。作为一名病

理学教授，他深知各大医学院校尸源紧缺已成为医学教育的潜在危机。在市政协的提案中，他首次提出要加快发展病理事业，应大力提倡遗体的捐献，并多次在市政协座谈会上表示，带头捐献遗体，死后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做一次最后的奉献。1991 年 1 月，顾老因病去世，为了毕生追求的医学事业，顾教授最后奉献出了自己的遗体。

1982年 3 月，来自上海的十五位党、政领导干部和顾问集体承诺——自愿在身后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在这些干部名单里，就有来自九三学社的上海市卫生局副局长朱瑞镛教授（1919－ 1994）。他们的身先士卒和垂范精神，极大鼓励了普通民众改变思想、移风易俗。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读者纷纷给报社写信，要求登记捐献遗体，让生命的意义，能以另一种方式造福人世。

1982年 9 月，市卫生局与市红十字会制定《上海市接受志愿捐献遗体暂行办法》，经市政府批准后在国内率先实施，由市红十字会承办，先后在上海医学院等 6 个医学院校建立了“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正式开创了我国大陆地区的遗体捐献工作。

1995年 6 月，上海市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红十字条例》，将“开展志愿捐献遗体工作”列入红十字会工作职责。

1998年，上海市人大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列入市人大《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五年（1998—2002 年）立法规划建议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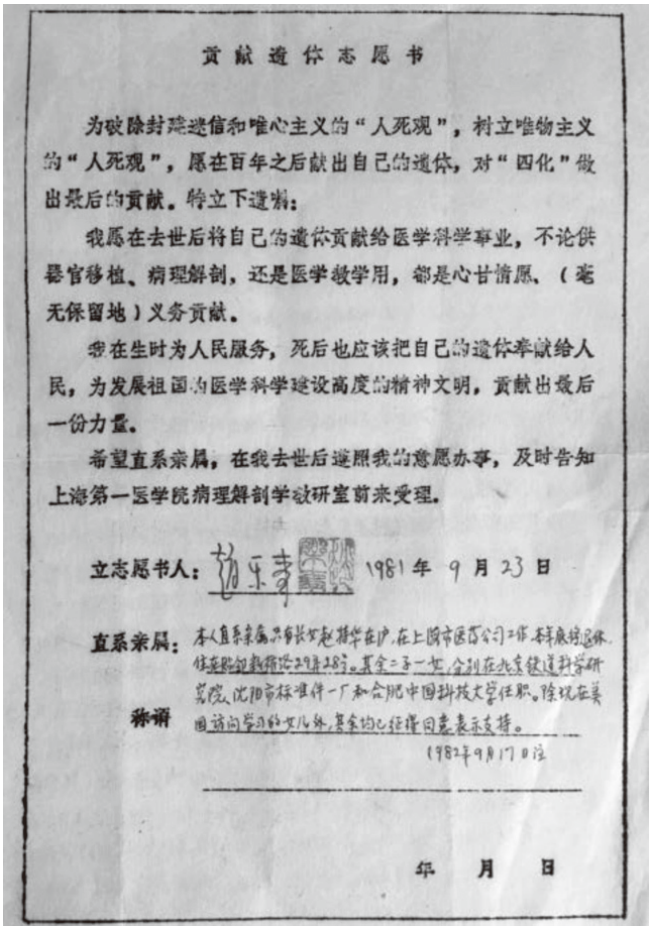
2000 年 12 月，上海市人大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正式审议通过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草案）》。

2001年 3 月 1 日，全国第一个有关遗体捐献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正式颁布施行。

纵观上个世纪 80 年代，由于市领导和老干部们的引领，一大批包括九三社员在内的医学界老专家和教授们的大声疾呼、率先垂范作用，极大地鼓励了普通民众改变思想、移风易俗，纷纷要求登记捐献遗体。其精神与大爱令人感动和敬佩。

## 志愿捐献，九三第一

1982年，自上海红十字会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正式创立后，就陆陆续续有市民前往登记。那么，究竟谁是上海第一个登记遗体捐献的人？谁又是上海第一个实现遗体捐献的人呢？据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坦言，这些“最早”都发生在市红十字会开展遗体捐献工作的前一年，即 1981年。在市红十字会遗体（角膜）捐献纪念网站上，1981 年登记遗体捐献的志愿者一共有两位，赵乐事先生（1904－ 1982）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们有幸查阅到赵乐事先生写于 1981 年 9 月 23 日的遗体捐献志愿书，并在其简介中有惊人的发现：赵乐事先生是九三社员！



贡献遗体志愿书

为破除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的“人死观”，树立唯物主义的“人死观”，愿在百年之后献出自己的遗体，对“四化”做出最后的贡献。特立下遗嘱：

我愿在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贡献给医学科学事业，不论供器官移植、病理解剖，还是医学教学用，都是心甘情愿、（毫无保留地）义务贡献。

我在生时为人民服务，死后也应该把自己的遗体奉献给人民，为发展祖国的医学科学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贡献出最后一份力量。

希望直系亲属，在我去世后遵照我的意愿办事，及时告知上海第一医学院病理解剖学教研室前来受理。

立志愿书人：赵乐事 1981 年 9 月 23 日

直系亲属：本人直系亲属只有长女赵静华在沪，在上海市医药公司工作，本身患有肺心病，体质较弱，教龄满25年28天。其余三子一女，分别在北京铁道科学研究院、沈阳市标准件一厂和合肥中国科技大学任职。除现在要回答问学习的女儿外，其余均已征得同意表示支持。

1982年9月17日注

年 月 日

**上海市第一份遗体捐献志愿书：九三社员赵乐事先生的遗体捐献志愿书**

解放初期，赵老即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黄埔区支社主任委员、黄埔区政协常委和人大代表等职务。解放前，赵老曾任过民营大陆广播电台的台长。该电台曾为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等团体举行义卖音乐会播音，募集经费救济难民和支援新四军抗日。

据赵老记述：他曾于1958年11月间，同颜福庆、董承琅二老同车赴北京开会；1959年春，又在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与倪葆春同志同学。三位医学专家都很关心赵老的健康，督促他积极治疗。

与赵老同行的三位九三先贤，除董老于1992年病逝美国外，颜老和倪老都大力倡导遗体捐献，并身体力行。颜老的事迹在此就不再赘述。倪老（1899－1997）是著名的医学家、中国整形外科先驱、国家一级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第1、2、3届人大代表、政协第5和第6届的委员等。1983年，他就填写了遗体捐献志愿书。1997年10月28日，倪老因病去世，实现了捐献遗体的愿望，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医学事业。

半个多世纪前，几位九三先贤或同车赴京开会，或同在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数十年之后，他们虽职业不同，但殊途同归，都为上海遗体捐献工作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是九三的骄傲！他们是中国的楷模！

## 引领红会，弘扬捐献

作为红十字会的引路人，历任理事长们前赴后继、殚精竭虑地推动上海市的遗体捐献工作的发展，他们或率先垂范，肩负起创立我国首批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的历史重任，或忠实贯彻实施我国首部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并在法规颁布实施后，推出一系列创新举措，助推遗体捐献工作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

原上海市副市长、九三学社主委谢丽娟同志于1990年被推选为红十字会理事长，任期近20年。谢主委于1961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从医20余年，非常了解尸体解剖在医学中的重要性。上海市红十字会在她的领导下，自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于2001年颁布实施以来，每年都举行富有特色的主题纪念活动，并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如将每年的3月1日设定为遗体捐献纪念日；创造了众多中国第一，如首座红十字遗体捐献这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园、纪念网站以及第一首为遗体捐献志愿者、实现者所创作的歌曲《生命之歌》等。

这些创新性举措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并涌现出许许多多的感人事迹，如荣获“博爱家庭”、“奉献之星”、“浦东好人”称号的戎宏之家庭就是其中之一。

戎宏之女士出生于医学世家，她的祖父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名医，她的父母亲也是医务工作者。1997年，当父母要去办志愿捐献遗体手续时，子女们还难以理解，是父母的一席话打动了他们：“我和你们爸爸这一生既平凡又渺小，如果在生命的最后还能为人类的未来做出一点贡献，那就是我们的心愿。”在两位老人家相继病逝，实现遗体捐献愿望后，受他们的影响，他们的子女及其他亲属共13人也相继加入到捐献遗体志愿者行列，成为了人间大爱的最美接力者。戎宏之和她的家人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遗体捐献队伍中来：“生死轮回，赤条条来去本身就该无牵无挂。人死了之后，身体对本人来说已没有意义，若身后还能为社会为人类做贡献，那等于是把自己的生命延续了下去。”

从1982年在全国率先建立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至今，不过34年，从2001年颁布实施全国首部遗体捐献地方性法规至今仅有15年。就在这短短的二、三十年，由最初的举步维艰，到如今的蔚然成风，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原中国红十字会彭佩云会长曾多次到上海视察红十字遗体捐献工作，对上海遗体捐献工作给与很高的评价，并为徐汇区遗体捐献志愿者之家欣然题词：“遗体捐献志愿者工作是一项崇高的文明事业，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

上海的遗体捐献工作之所以有今天让人欣喜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归纳为一句话，那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众人当中，既有众多九三先贤们坚持不懈的大力提倡和率先垂范，更不离开上海市红十字会会长、九三学社上海市委老领导谢丽娟主委殚精竭虑的积极引领、开拓创新和默默奉献。他们的历史功绩将载入史册。

## 九三群英，继往开来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了解到九三学社上海市领导和部分先贤们在遗体捐献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然而，为此作出贡献的还有更多的九三人，他们的事迹或见诸报道，或默默无闻，据不完全统计，完成志愿捐献遗体登记和实现捐献的上海九三社员及其家属数以百计。由于篇幅所限，以下仅介绍部分社员的事迹。

（1）荣独山（1901－1988），原上海医学院著名放射学家、国家一级教授，曾任第1－6届上海市政协

委员、常委。1988年荣老因病去世，实现了自己生前捐献遗体的愿望。

（2）戴天右（1904 — 2002），原上海医学院公共卫生学二级教授.中国妇幼保健创始人之一，曾任第1—6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戴老于1986年就写下遗体捐献志愿书，2002年因病逝世，尊其遗嘱，家属将戴老遗体捐给上海医学院。

（3）孟庆闻（1927 — 2007），著名的鱼类学家、水产教育家，上海水产大学原院长、教授，原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和九三学社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全国政协委员。2007年因病逝世，根据孟庆闻先生遗愿，将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不举行追悼会和告别仪式。

（4）吴镇（1922 — 2007），上海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知名教授，九三学社社员，曾任上海市人大代表。2007年因病逝世，，按吴教授生前遗愿，遗体将全部捐献给医学教学事业，不留骨灰，不举行追悼会。

（5）百岁老社员沈鼎鸿教授（1911 — 2011）捐献遗体：沈鼎鸿教授（著名的微生物学家，九三学社交大医学院委员会社员沈鼎鸿教授因病去世，享年101岁。沈鼎鸿教授生前表达了逝世以后志愿捐献遗体的崇高愿望，要把自己的一生无私地奉献给他深爱着的祖国医学教育事业。

（6）马国钧（1924 — 2007），原上海医学院病理学家、教授，解放前曾被国民政府征调美军翻译、训练中国军医，后任军事调定处美方代表翻译。文革中，他被四人帮迫害入狱近8年，受尽非人折磨。晚年他罹患罕见恶性肿瘤，认为很有医学价值，要求生后捐献遗体做病理解剖，为病理学研究做了最后的贡献。

（7）周敬修（1925 — 2012），原上海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2012年周教授因病去世，此前他的夫人和妹妹已经实现遗体捐献，一家3口全部为医学事业作贡献。

（8）孙曾一（1922 —）、吴劫彝夫妇（1922 —）：孙曾一、吴劫彝分别为肿瘤学和妇产科教授，早在50年代他们就加入了九三学社，孙教授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上海市委副主委、政协委员等职。二老已于2014年双双填写遗体捐献志愿书，希望为医学事业作出最后的贡献。

总而言之，不论是各级领导，还是普通社员；不论是医学专业，还是非医学专业；不论是耄耋老人，还是青年才俊，他们都是九三学社的一分子，他们是继往开来的九三群英。相信以科学与民主为宗旨的九三人，一定会以九三先贤为榜样，为我国遗体捐献事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 论九三学社的语言文字工作者

张大英

语言文字是国家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九三学社一直关注的问题。比如1996年全国政协专门召开座谈会讨论语言问题，座谈会由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金开诚主持[1]。再比如九三学社中央信息中心发布了《应重视北京和青岛等奥运主办城市和旅游城市的国际语言标示工作》（2006）的信息[2]，九三学社中央思想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巽达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优雅的汉语容不得粗鄙化》（2012）、《新媒体应为优雅语言垂范》（2015）[3]，呼吁大家关注语言问题。

学习社史发现学社里有一批语言文字工作者，他

1.参见《全国政协座谈语言问题》一文，载《语文建设》,1996,03:38.

2.http://www.93.gov.cn/html/93gov/lxzn/czyz/sqmy/566924983461740510 2.html，九三学社社员、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董蒨所提建议。

3.见《光明日报》,2012—01—13003.《光明日报》,2015—08—20002.

们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热爱民主、科学，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下面将所收集的有关九三学社里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们的资料结合九三学社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整理介绍。

## 九三学社创建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者

首先是九三学社创建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者。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座谈会，1944年底一批进步学者为争取抗战胜利和政治民主，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民主、科学精神，在重庆组成民主科学座谈会，讨论时局，发表政见。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于1946年5月4日在座谈会基础上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在参与创建九三学社的过程中有语言文字工作者们的身影，这里我们选取两位进行介绍。

（一）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

黎锦熙（1890 — 1978），字劭西，湖南湘潭人，语言文字学家、词典编纂家、文字改革家、教育家。1946年黎锦熙年参与创建九三学社，九三学社正式成立时，黎先生被公推为“九三”的八位监事之一，在九三学社的第一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上，又被推举为常务监事，是九三学社成立初期的核心人物之一。黎锦熙曾经是毛泽东青年时期在湖南省第一师范上学时的历史老师[1]，毛泽东对他十分尊重，他向毛泽东“谈起了自己与许德衍等人创建九三学社的经过，使得毛泽东对九三学社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2]。

黎锦熙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先后参加了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等大量的工作，并著有《国语新文字论》、《论注音汉字》、《字母与注音论丛》、《文字改革论丛》等专著，为中国的文字改革事业做出了举世瞩目的巨大贡献[3]

（二）语言学家翻译家初大告

初大告（1898 — 1987），山东人，翻译家，历任河南大学英文教授、重庆复旦大学英文教授兼教务长、西北大学外文系主任，西北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建国后到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授。1945年9月3日与许德衍、潘菽等民主人士一起筹建了九三学社[4]，曾经担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初大告英语教学经验丰富，精通世界语，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开设世界语课，生前曾当选为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此外还精通日语、俄语、法语等。初大告主要译著有《新定章句老子道德经》、《中华隽词》、《中国故事集》等英译本（在英国出版）。编著有《英语语音学讲义》、《英文教学法》、《中英文法的比较》、《英语发音法》等。他还积极发起并参加新中国第一部《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

## 九三学社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语言文字工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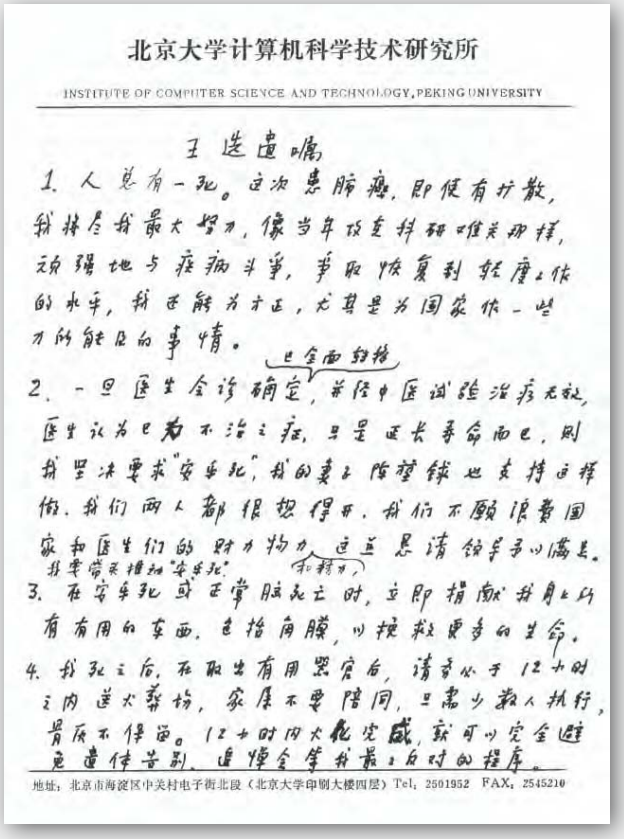
九三学社成立初期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学社的工作重点是支持解放战争、参与建国以及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这一时期又有不少语言文字工作者加入九三学社，我们选取七位进行介绍：

（一）语言学家古典文献学家魏建功

魏建功（1901 — 1980），字天行，别号山鬼，江苏人，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奠基人。魏建功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并且担任九三学社第三、四、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魏建功教授毕生致力于汉语文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声韵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他讲授过多种语言文字学课程，为发展祖国的语言文字科学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热情关怀青年的进步和成长，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所教过的学生很多现已成为知名的专家学者。他撰写的《古音系研究》等论著在汉语言语音的研究

1. 小卫．毛泽东和九三学社的朋友们[J]. 四川统一战线，2011,05:45.
2. 章慕荣．毛泽东与语言文字大师黎锦熙[J]. 党史纵览，2006,06:7.
3. 章慕荣．毛泽东与语言文字大师黎锦熙[J]. 党史纵览，2006,06:7.
4. 唐太金，任致学．逝世人物（一）初大告 [A] ．李化诚，史学通主编．山东年鉴 [C]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788.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KING UNIVERSITY

王选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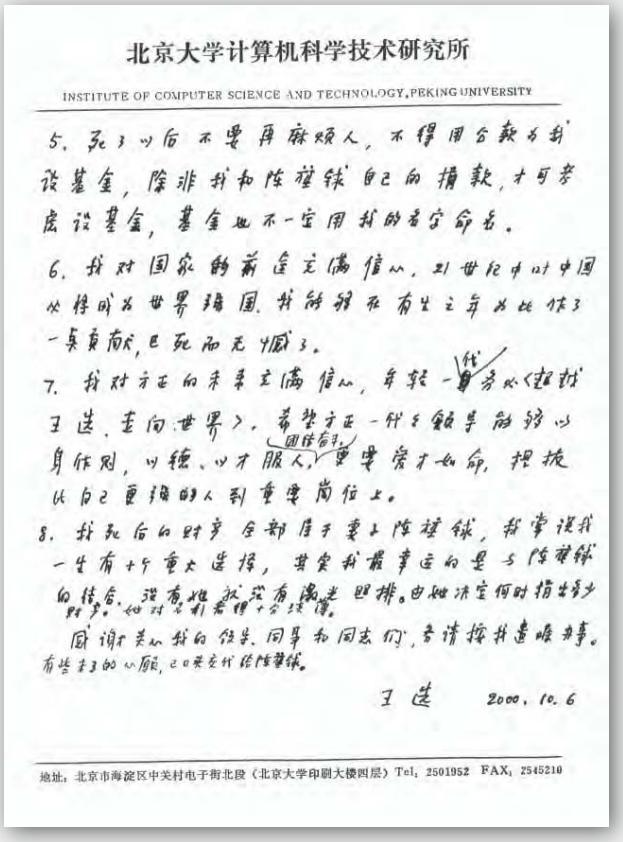
1. 人总有一死。这次患脑癌，即便有扩散，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较康之作的水平，我还能为才正，尤其是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一旦医生全诊确定，并经中医证据治疗无效，医生认为已为不治之症，只是延长寿命而已，则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祖铁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得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还望谅解学习为盼。

3. 在安乐死或正常脑死亡时，立即捐献我身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角膜，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4. 我死之后，在取出有用器官后，请务必于12小时之内送太平间，家属不要陪同，只需少数人执行，骨灰不保留。12小时内大概完成，就可以完全避免遗体告别、追悼会等我最忌讳的程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电子街北段（北京大学印刷大楼四层）Tel：2501952 FAX：2545210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KING UNIVERSITY

5. 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不得用公款为我设墓金，除非我和陈祖铁自己的捐款，才可考虑设墓金，墓金也不一定用我的名字命名。

6. 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作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7. 我对方正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方正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更要学会如何，把权力交给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8. 我死后的财产全部属于妻子陈祖铁，我常说我一生有十个重大选择，其实我最重要的是与陈祖铁的结合。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一切。由她决定何时捐出多少财产。她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

感谢关心我的领导、同事和同志们，务请按我遗嘱事。有些主动的心愿，已口头交代陈祖铁。

王选 2000.10.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电子街北段（北京大学印刷大楼四层）Tel：2501952 FAX：2545210

王选遗嘱（一）　　王选遗嘱（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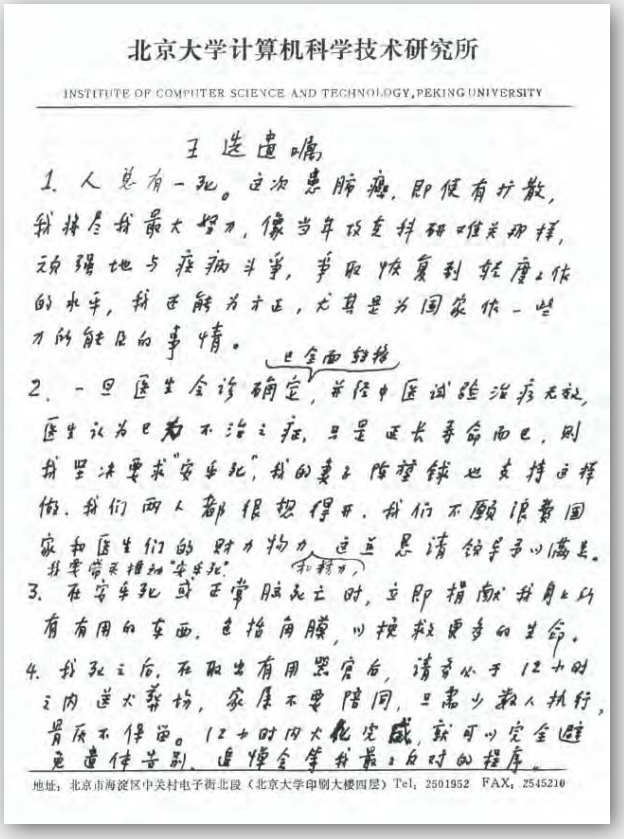
2002年2月，王选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江泽民主席颁奖。

1999年，王选（主席台右二）赴杭州为九三社员作学术报告。

王选（前排左一）与韩启德主席在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会议上。

1999年，王选（主席台右二）赴杭州为九三社员作学术报告。

王选（前排左一）与韩启德主席在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会议上。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KING UNIVERSITY

王选遗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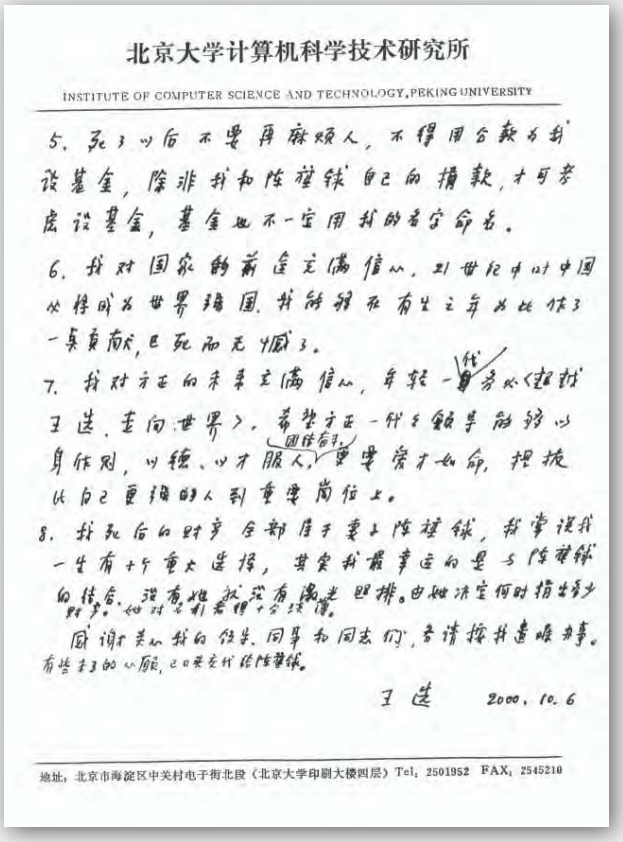
1. 人总有一死。这次患脑癌，即便有扩散，我将尽我最大努力，像当年攻克科研难关那样，顽强地与疾病斗争，争取恢复到较康之作的水平，我还能为才正，尤其是为国家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2. 一旦医生全诊确定，并经中医证据治疗无效，医生认为已为不治之症，只是延长寿命而已，则我坚决要求"安乐死"，我的妻子陈祖铁也支持这样做。我们两人都很想得开，我们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还望谅解学习为盼。

3. 在安乐死或正常脑死亡时，立即捐献我身上所有有用的东西，包括角膜，以挽救更多的生命。

4. 我死之后，在取出有用器官后，请务必于12小时之内送太平间，家属不要陪同，只需少数人执行，骨灰不保留。12小时内大概完成，就可以完全避免遗体告别、追悼会等我最忌讳的程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电子街北段（北京大学印刷大楼四层）Tel：2501952 FAX：2545210



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

INSTITUTE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EKING UNIVERSITY

5. 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人，不得用公款为我设墓金，除非我和陈祖铁自己的捐款，才可考虑设墓金，墓金也不一定用我的名字命名。

6. 我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21世纪中叶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我能够在有生之年为此作了一点贡献，已死而无憾了。

7. 我对方正的未来充满信心，希望方正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能够以身作则，以德、以才服人，更要学会如何，把权力交给自己更强的人到重要岗位上。

8. 我死后的财产全部属于妻子陈祖铁，我常说我一生有十个重大选择，其实我最重要的是与陈祖铁的结合。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一切。由她决定何时捐出多少财产。她对我来说是无价之宝。

感谢关心我的领导、同事和同志们，务请按我遗嘱事。有些主动的心愿，已口头交代陈祖铁。

王选 2000.10.6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电子街北段（北京大学印刷大楼四层）Tel：2501952 FAX：2545210

王选遗嘱（一）　　王选遗嘱（二）

2002年2月，王选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江泽民主席颁奖。

上均占有重要的地位。

（二）语言学家史学家方国瑜

方国瑜（1903 — 1983），字瑞臣，纳西族，云南人，教授，著名史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九三学社成员，曾任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任。

方国瑜曾在京师大学研究院、私立民国大学、洛阳师范学院和云南大学历史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历任编辑、教授、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和云南通志馆的编审、审定、续修委员及云南省民委委员、全国人大民委委员、省博物馆筹委会副主任、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副组长等职，在中国民族历史、中国西南边疆史地、云南史料目录、东巴文化等方面都做出了杰出成就。方国瑜的代表作有《纳西象形文字谱》、《广韵声汇》、《广韵声读表》、《隋唐声韵考》、《慎子考》、《慎子疏政》、《论学存稿》、《新纂云南通志》等。

（三）语言学家档案专家张德泽

张德泽（1905 — 1998），字洵如，河北人，语言学家、明清档案专家、清史专家，九三学社社员。

张德泽一生主要从事档案工作，1956 年任国家档案局第一历史档案馆保管组组长、副研究馆员。1995 年被评为有特殊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主要学术成果有《清代国家机关考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平音系十三辙》等，发表学术论文和文章 30 余篇。

（四）语言学家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

胡厚宣（1911 — 1995），甲骨学家、史学家。胡厚宣 1950 年代初就加入了九三学社，他还是九三学社 1992 年中央参议会议委员。

胡厚宣自 40 年代起即闻名于海内外历史考古学界，不断创造出超越前人的辉煌成绩，也给后人留下良多珍贵的文化财富。他培养的弟子历史学家宋镇豪也是九三学社社员，为甲骨学研究传承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语言学家教育家廖序东

廖序东（1915 — 2006），湖北人，语言学家、教育家。廖序东 1950 年参加九三学社，热心于民主和科学的促进工作。1983 年 3 月，他被九三学社徐州市委员会评为优秀社员，1996 年 9 月 11 日，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九三学社徐州市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1999 年 4 月 13 日，出席九三学社徐州市委会先进支社、优秀社员表彰大会。

廖先生是徐州师范大学中文系和汉语学科的创始人。他在方言研究、教学语法研究、楚辞语言研究、《马氏文通》研究以及语言学名著的评介与翻译等方面都比较有成就。他与黄伯荣先生共同主编的教材《现代汉语》深受欢迎，由教育部确定为高校文科通用教材。1984 年 3 月 24 日，他还与鼓楼区政协办公室共同筹办徐州市方言调查班。

（六）语言学家翻译家李赋宁

李赋宁（1917 — 2004），祖籍陕西蒲城。西方语言文学大师，著名教育家、翻译家，九三学社成员，曾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李赋宁 194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曾任西南联大外语系讲师，1946 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留学，获该校英国语言文学硕士学位，1950 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北京大学西语系和英语系教授、副教务长及英国语言文学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办公室学科评议组成员。1946 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漫谈英语学习》、《李赋宁论英语学习和西方文学》等。

（七）语言学家汉语史学家向熹

向熹（1928 —），湖南人，中国当代语言学家、汉语史学家、九三学社社员。

向熹 1954 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继续攻读汉语史专业研究生。任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教授，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向先生致力于汉语研究，主要著作有《简明汉语史》《诗经词典》《诗经译注》《古汉语知识词典》《简明古汉语字典》等。

## 九三学社恢复之后的语言文字工作者

文化大革命期间，九三学社被迫停止活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九三学社恢复了活动。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九三学社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更多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加入了九三学社，坚持民主与科学大旗，在更多领域做出成就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此我们选取九位进行介绍。

（一）语言学语用学专家钱冠连

钱冠连（1939 —），湖北人，教授，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九三学社主委。

钱冠连1962年毕业于华中师大外语系，1981 — 1982于武汉大学进修英美文学，1983 — 1984复旦大学进修英美文学、修辞、翻译，1992 — 1993在国际语用学会研究中心（设于比利时安特卫大学）任合作研究员。他先后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语言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硕士导师，该校学报《现代外语》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语言学、西方语言哲学、语用学。在国内外发表语言学、语用学论文近60余篇，专著五部。

（二）法律语言学专家潘庆云

潘庆云（1943 —），法学教授，男，浙江人，现任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教授、上海中信正义律师事务所律师等职，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学习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潘庆云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全国首批语言学硕士学位。他撰写的专著和论文综合运用法学、现代语言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成果，结合我国的司法与法律实践，同时有较好的外语能力（英语熟练，初通法、俄等外语），能及时借鉴、汲取国外学者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因此他的法律语言学著述视角广阔、立法科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潘教授是一位“复合型人才”，集语言学专家、法学教授、执业律师于一身。

（三）文学、翻译学专家辜正坤

辜正坤（1952 —），文学博士，世界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所长，获国务院颁发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国际中西文化比较协会会长（并列）、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莎士比亚研究分会会长。辜正坤曾经两次获得九三学社北京市先进个人奖（1992，1996）。

辜正坤致力于莎士比亚、翻译学、中西文化和文学比较、诗歌鉴赏学等研究，曾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美国瓦西塔大学客座教授，曾应邀任联合国教科文总部（巴黎）翻译和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翻译。在国内外共发表著、译、编、校著作48种（部），论文150余篇。代表性专著有《莎士比亚研究》、《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中西文化比较导论》、《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译学津原》等。译著有《老子道德经》（汉英对照）、《毛泽东诗词》（汉英对照译注）、《元曲150首》（汉英对照）、《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英汉对照）等。

（四）法律语言学专家杜金榜

杜金榜（1953 —），河南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律语言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教授，九三学社社员。

杜金榜是法律语言学研究的带头人，出版了专著《法律语言学》，为法律语言学学科的建立和成长立下了根本，并负责中国法律语言学研究会任务，与国内外同行的联系密切，在法律语言学界很有影响。

（五）古典文献学专家黄征

黄征（1958 —），又名黄徽，祖籍江苏，出生于浙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敦煌文献方向和唐代文献方向博士生导师，并兼任南京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甘肃省敦煌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常务理事、《唐研究》编委。九三学社社员。

黄征1996年起参与主编高校古委会、“董氏文史哲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敦煌文献合集》，2000年起负责南京师范大学“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特聘教授启动项目。他用训诂的方法解决敦煌文献中的语言文字难题，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其合著《敦煌变文集校议》曾获“王力语言学奖”和“全国首届古籍整理优秀成果奖”，合著《敦煌变文校议》曾获“中国青年语言文学家奖”一等奖、“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等，研究敦煌语言文字学的论文集《敦煌语文丛说》在海内外也得到专家好评。此外，还参与编著《敦煌文献语言词典》、《浙藏敦煌文献》等重要工具书，编著教材《劫尘遗珠——敦煌遗书》，撰写近百篇论文，以及发起对南京栖霞山石窟艺术遗存的考察，也都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六）认知语言学专家刘正光

刘正光（1962 —），教授，任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副会长、湖南省翻译协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理事等，湖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湖南省第十届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院长，湖南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曾任湖南大学九三学社委员会副主委、

湖南省九三省委委员。

刘正光发表学术论文 70 余篇，其中外国语言文学类核心刊物论文 50 多篇（CSSCI 收录 40 多篇），各类转载和收录 10 多篇，出版著作 9 部。其《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相关的系列论文中提出的“语言非范畴化”理论，完善和发展了语言范畴化理论，在学术界评价很高。

（七）语言测试专家邹申

邹申（？—）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目前为上海市第十一届政协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英语专业教学分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外国语大学委员会主委。

邹申主要从事外语教学法及语言测试研究，曾主持 1996 年版及 2004 年版高校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大纲的修订工作。目前负责英语专业四、八级考试的相关研究及工作。[1]

（八）外文数据库专家邢昭

邢昭（？—），女，山东人，曾任四川大学九三学社第六支社副主任委员，曾被评为九三学社四川省优秀社员。每年她都深人社会调查研究，认真撰写提案，努力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参政议政，多次获优秀提案先进个人。2010 年她撰写提案《在西部大开发中开创“双语武侯”带动“双语成都”人文环境的建议》，已成为武侯区政协 2002 年确定和督办的 4 件重点提案之一[2]。

邢昭身残志坚，自学外语，并出国留学，曾在四川大学《苏轼诗文词评述》编纂组、《英语语法辞典》编纂组、外文系外国专家组、英美文学教研室工作，现在四川大学 CALIS 西南中心外文数据库工作。在省部级、国家级核心期刊发表多篇有关外国文学、现代哲学、现代语言学、跨文化研究、符号学、翻译学、图书情报学、妇女研究等领域的学术论文，并多次荣获学术奖项。

（九）心理语言学专家杨小虎

杨小虎（1974 —），男，四川人，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中国认知神经语言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心理语言学研究会理事，九三学社成员。

杨小虎 2006 年在上海交通大学获得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博士学位，2008 — 2010 年在南开大学文学院从事实验语音学方向博士后研究。2001 年起先后任教于西南交通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兴趣涉及心理语言学、语言教学以及实验语音学等领域，目前从事噪音背景下的外语交流研究，还担任《心理科学》、《现代外语》等心理学和语言学刊物审稿人。

## 总结

九三学社的语言文字工作者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以上只是一小部分代表。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九三学社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有语言文字工作者的参与，他们热爱民主与科学，积极在自己的工作领域内做贡献。这些九三学社里的语言文字工作者前辈们的成就也激励着后辈继续努力前行。相信在将来的九三学社历史上，语言文字工作者们会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且利用九三学社这个大舞台，与其他领域的专家进行跨学科合作，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更大贡献，促进学社的进一步发展。

（本文作者为青岛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1.http://www.shisu.edu.cn/DoctorialTutor/2012/2012,DoctorialTutor,001161.shtml

2. 吴青苗 . 不可征服的意志——记九三学社社员、四川大学副教授邢昭 [J]. 四川统一战线 ,2003,10:24—25.

# 穿军装的九三人

刘　华

穿越历史的硝烟，透过岁月的风雨，在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一路百折不挠、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艰辛历程中，不时闪耀着九三学社社员的身影。下面，就让我们看看他们都是谁！

## 程开甲：实地看了心里才踏实

程开甲1953年加入九三学社，是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正军职常任委员，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创建者和领路人，“两弹一星”元勋，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和国防高新技术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50多年前，为了打破大国核讹诈，程开甲听从祖国召唤，二话没说毅然来到罗布泊这片死亡之海，住帐篷、喝苦水、战风沙、无怨无悔。原子弹研制初期，程开甲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分管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在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两弹结合以及首次地面空投、地下平洞和竖井试验在内的30多次实验中，他爬进测试廊道、测试间，甚至最危险的爆心，始终亲临一线指导技术工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有到实地看了，我心里才踏实”。程开甲的话语传递的是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精神力量。为了国防事业，程开甲隐姓埋名近40年，直到1999年9月18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才从幕后走向台前。

步入耄耋，程开甲不顾年迈，仍在材料理论、高功率微波继续开拓研究领域。“我们艰苦奋斗的传统更重要的是刻苦学习、顽强攻关、勇攀高峰的拼搏精神，是新观点新思想的提出和实现，是不断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他对艰苦奋斗的诠释，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过程中，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科研成果和荣誉面前，程开甲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始终强调集体智慧的结晶，努力为年轻人成长成材创造条件。他说：“我只是代表，功劳是大家的。我们的核试验，是研究所、基地所有参加者、有名的无名的英雄在弯弯曲曲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去完成的”。程开甲淡泊名利、提携后学的崇高品格，赢得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尊敬和爱戴。2013年，95岁高龄的程开甲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陈芳允：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

陈芳允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7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他是无线电电子学家，空间系统学家，中国卫星测量、控制技术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

上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军方GPS（全球定位系统）开始投入使用，并长期占据垄断地位。在提供定位、

测速和时间标准的同时，美国军方可以通过降低对方导航精度、变换编码、进行区域性管理等方式限制国内外用户对 GPS 的使用。为了打破受制于人的局面，上世纪 80 年代，陈芳允开始致力于研制中国自己的“GPS”。早年从事雷达工作时，他就注意到定位导航问题的重要性。他详细研究了美国全球定位导航系统，认为 GPS 对于军事应用虽有一定优点，但用作全球、全时间工作，需要 18 颗以上卫星，极不经济。1983 年，陈芳允等科学家提出，利用两颗同步定点卫星进行定位导航的设想，只用两颗卫星即可完成基本定位功能，这是根据中国自己的需求和当时经济实力确定的。该系统后来被称为“双星定位系统”。1989 年，利用我国自己的两颗通信卫星进行演示试验，获得十分满意的结果。陈芳允作为总体负责人，还承担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跟踪、测量和控制任务，并填补我国核弹试验中一项重要测量仪器空白。

2000 年 10 月，两颗北斗导航实验卫星的成功发射，标志着中国继美国、前苏联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遗憾的是，在此 6 个月之前，北斗系统理论奠基人陈芳允因病去世，最终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成为现实。

“人生路必曲，仍须立我志。竭诚为国兴，努力不为私。”“四十京兆一技人，求新服务不爱名，一称专家已过誉，惭愧国人赶超心！”这是陈芳允做的两首诗，也是他人格风范的真实写照。

## 王淦昌：以身许国核弹先驱

1952 年夏王淦昌（右）与吴桓兴

1950 年 10 月，王淦昌加入九三学社。1952 年，美国帝国主义在朝鲜战场使用了一种炮弹，威力很大，志愿军方面怀疑是原子炮，上级命令中科院派人到朝鲜战场实地考察。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丁瓒征询时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的意见。“好，我去！”王淦昌没有丝毫犹豫。能够到朝鲜战场为抗美援朝作一点贡献，王淦昌感到很兴奋，同时也觉得有些担心，毕竟第一次上战场，还承担着一项艰巨任务。由于任务密级高，在做好各种准备后，他只能对家人说，出趟差。出发日期、路线及同行人也要保密，王淦昌与北京日坛医院教授吴桓兴先走，近代物理所研究实习员林传骝和通讯兵部小常同志随后跟上。

到了丹东，到处可见战争物资，战争气氛很浓。王淦昌与吴桓兴换上志愿军军装，感到非常兴奋。吴桓兴问，照张相如何？“好！”于是，有了这张穿军装的照片。当天晚上，他们乘火车跨过鸭绿江，到了朝鲜新义州。在朝鲜战场工作 4 个月后，王淦昌回到北京。由于任务完成出色，他荣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

上世纪 60 年代，王淦昌任核武器研究院研究员，不久又被任命为副院长。从此，王淦昌改名王京，隐姓埋名 17 年，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研制以及地下核试验做出了重大贡献。1986年，王淦昌与陈芳允、王大珩、杨家墀等 4 位科学家上书中共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并被采纳，即著名的 863 计划。1999年，王淦昌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为庆贺王淦昌 80 寿辰题字：“无私奉献，以身许国，核弹先驱，后人楷模”。这 16 个字彰显了王淦昌强烈的责任担当与浓重的家国情怀。

## 吴阶平：国之良医

1950 年 10 月，伴随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嘹亮歌声，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与此同时，国内也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群众运动，吴阶平感到自己“被深深教育、感动了”。1951年 2 月，吴阶平报名参加第二批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第二批志愿军手术队主要由北京医学院、协和医院、北京市市立三院医护人员组成，吴阶平担任队长。

3 月的北京春寒料峭，能容纳 1200 余人的长安大

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第二队离京时，中央卫生部贺诚副部长、市卫生局张文奇局长等前往车站送行。图为贺诚同志与志愿手术队队长吴阶平握手。

1952年志愿军反细菌战检验队合影（处理）（方亮：三排右4，方亮夫人胡善珠：一排中）

戏院却春意盎然、座无虚席。首都各界人士和志愿军手术队队员的家属在这里欢送北京市抗美援朝志愿军手术队。北京市领导作了简单发言后，顾问吴英恺和队长吴阶平分别上台发言，吴阶平穿上军装，戴上棉帽，式样和解放军的十分相似，只是没有领章和帽徽。

抵达长春后，吴阶平带一部分医生来到条件较差的34队，把老学长和部分医生留在条件较好驻扎在长春市立医院的36队。在这里，吴阶平第一次和农民出身的志愿军战士一起生活、工作。在他的带领下，全队工作出色，收治的几批危重伤员无一死亡。为此，吴阶平荣立大功。

1952年，吴阶平郑重向中共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党委给他的答复是："你的社会关系很复杂，有亲戚现居美国，一时难以调查，还是先参加民主党派吧。"想到九三学社是一个进步的知识分子组成的民主党派，自己还比较合适，1952年，吴阶平加入九三学社。

吴阶平长期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人医疗保健工作，为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健康作出重要贡献，并先后11次为5位外国元首进行治疗，为增进我国与有关国家的友谊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九三学社的杰出领导人，吴阶平带领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承和发扬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优良传统，积极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职能，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 方亮：坚决打垮敌人的细菌战

1952年初，美军在朝鲜战场上实施细菌战，用军机连续在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阵地和后方上空，大量播撒负荷细菌的各种昆虫。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机68批、448架次侵入东北领空，在抚顺、新民、安东、宽甸、临江等地播撒大量负荷细菌的昆虫，并对临江、长甸河口地区进行轰炸扫射。3月，方亮以细菌学专家身份参加"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担任由70多人组成的抗美援朝反细菌战检验队副队长，赴朝鲜前线及我国东北开展调查工作。后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共10多种。他们的调查工作，向国际社会揭露了美军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灭绝人性的无耻行为。

当年8月，方亮在反细菌战最前线致信九三学社中央主席许德珩："我在前方遇见了直接或间接参加反细菌战工作的3位社员同志，记者孙承佩和专家严仁英、吴在东，会谈之下，感到兴奋愉快"，"我在这里和同我一道工作的专家们都抱着这样的精神，要坚决地打垮敌人的细菌战之后才回国"。9月初，方亮从朝鲜回国，荣获中朝两国颁发勋章。

这是一个个闪光的名字……

他们曾经是八一军旗下的一员！

他们为国防和人民军队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功勋！

他们是九三学社的骄傲与自豪！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办公厅主席秘书办公室主任）

# 九三学社组织发展政策调整的轨迹

但 勇

民主党派组织发展政策主要涵盖两方面内容：一是发展成员，二是建立组织（包括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九三学社章程》涉及组织发展政策的地方共有四处，分别是第一章社员之第一条、第二章组织制度之第十五条、第四章地方组织之第二十九条、第五章基层组织之第三十七条。笔者身为九三学社中央组织部的一员，亲历、感受、见证了近 20 年来组织发展政策调整变化的全过程，尝试对照社章条文回顾和描述这一政策调整的轨迹。

**第一条　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赞成并愿意遵守本社章程，可申请加入本社。**

“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以及高等教育、医药卫生等方面的高、中级知识分子”的含义如何理解？长期以来存在不少模糊认识，对模糊认识不断澄清的过程即反映出社员发展政策逐步调整的思路。

数十年前，关于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的原初解析叫做“三师一员”。“三师”指的是工程师、讲师、主治医师，“一员”指的是助理研究员，这几个硬性职称条件构成入社门槛标准。事实上，“三师一员”涵盖了正高级、副高级、中级所有三师一员，完整地说应该是九师三员（即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工程师、教授、副教授、讲师、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治医师、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中级三师一员（工程师、讲师、主治医师、助理研究员）只是起步点、及格线，及格线以上当然是职称越高越好。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九三人的主流认识是科技界高、中级知识分子等同于“三师一员”或“九师三员”。高师高员 = 高级知识分子，中师中员 = 中级知识分子。那段岁月九三人身份识别标识基本就是高、中级职称，通俗点说，九三人约等于党外九师三员。如此一来，初级职称者——助理工程师、助教、医师、研究实习员便处于及格线以下，暂不具备入社资格，得等获得中级职称后方能申请入社。假如连初级职称都没有，恐怕只好被拒之门外了。

随着思想观念的解放，尤其是总纲所说实施人才强社战略的口号于 2002 年 12 月提出，九三学社组织发展政策与时俱进，发生两个方面明显变化。

第一，纠正简单机械的误读。

单从字面解，社组织发展本来就不局限于科技界，不局限于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医药卫生领域，“等方面”三个字意味着允许吸纳非科技界代表性人士。虽然科学技术、高等教育、医药卫生是三大主体界别，代表九三学社的界别特色，但是根据参政履职需要发展非主体界别（包含财政经济、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法律、政府机关、党派机关、基础教育等）优秀人才也应是政策鼓励的。上世纪 90 年代，其它党派早已放宽发展文艺界代表性人士的政策限制，电影演员潘虹、刘晓庆只向九三学社一家党派提出加入申请，当时的社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演艺界人士兴许与科学家群体格格不入、难觅共同语言，于是婉言谢绝。2003 年之后反思这个案例，颇觉惋惜。因此，实施人才强社战略，折射于九三学社组织发展的实用政策为：本着有利于提升参政履职能力与水平的原则，尽可能吸收主体界别和非主体界别高层

次人才。

第二，突破片面僵化的误区。

且看社员职称构成的变化。除传统“三师一员”外，还有建筑师、农艺师、畜牧师、经济师、会计师、统计师、审计师、某级美术师、某级律师、馆员、某级演员等，非师非员的高、中级职称还有编审、副编审、编辑等。即便只有初级职称甚至没有职称，如果在体制内工作并拥有高职务或高学历，则相当于具备高、中级职称。最近10年，社员中的高、中级职称总比例以及高级职称比例基本呈逐年下降态势，从某个侧面印证了人才强社战略不唯职称的创新理念。

近年来，体制外社员（新阶层社员和非公经济社员统称体制外社员）人数和比例迅猛增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除列举私营企业主等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外，还重新定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包括民营企业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及今后可能出现的新群体，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和留学归国人员中的相当部分都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之列。2016年，私营企业主社员占比1.7%，新阶层社员占比3.5%，几乎各类新阶层人士在社员中都有分布。

九三学社发展体制外优秀人才的最新政策为：重视吸纳科技型企业和新社会组织的高层次人才，把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区等作为发展社员的一个新的重点区域，重点发展符合我社界别特色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技术人员和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重视发展律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等中介组织的高中级管理人员，着力发展新媒体从业人员。发展私营企业主，要突出科技型企业，注重申请人素质。

于是，打造了一个扩大变通的“三师一员”升级版（公式表示）：

升级版“三师一员”=N师N员+高职务+高学历+成功人士（主要指体制外优秀人才）

人才强社理念不唯职称衡量高、中端人才特别是非科技界代表性人士，然而当前社员45.7%的高级职称比例、44.1%的中级职称比例、合计89.8%的高中级职称比例远远超过75.8%的主体界别比例的事实，表明大部分非主体界别社员也有高、中级职称。在革命性、颠覆性的高中级知识分子和高中端人才替代评价标准出炉之前，“三师一员”的老黄历恐怕短期内难以淡出惯性思维的基本面，无非是灵活务实的软杠杠更换了从前教条的硬杠杠而已。

现在组织发展政策正处于探索与调试阶段，绝非刻板的操作规程，允许试错，允许相机抉择，艺术与技巧充塞其间，灵活反应，拿捏得度，进退有节。从前的政策缺乏弹性（片面强调“三师一员”），可谓“管而死”。2003年以来的政策自由度越来越大，运用得好就“放而活”，运用不好或许就“放而乱”（淡化入社门槛并不意味着舍弃高标准降格以求）。当前形势下，一味地管固然不合时宜，一味地放也未必最佳选择，需要做到放管结合，放而活便放，放而乱则管，不怕收，不怕暂时退却，为了迂回前进。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值得提倡，不过实在吃不准的事情也不必勉强，可采取多观察、勿轻动的策略。坚持组织发展的高、中级和高、中端取向，涵养、积淀了九三学社的历史底蕴，为社组织赢得了口碑，正如邵鸿常务副主席所言，咱们九三学社还是有点“清誉”的。因此，每当执行、操作发展社员政策的具体环节，切莫忘本。总之，我们的政策既要不失灵活性，更要全力保持传统的人才平均高层次优势。

在人才强社战略引领下，九三学社主体界别的扩展或许成为新生事物。近年组织发展政策调研过程中，不少同志都认为：由高级技工、高级技师组成的“大国工匠”群体属于国家稀缺人才，他们从业于工程技术领域，相当于科技界代表性高、中级知识分子，充分体现了九三学社界别特色，应把大国工匠列为九三学社最新发展对象，20年前“不在工人、农民中发展民主党派成员”的政策规定明显不再适用于高级蓝领工人即高级技工、高级技师。此观点值得点赞，只是时机尚未成熟，需要耐心等待更加开明的民主党派组织发展政策出台。

**第十五条　本社组织发展坚持以大、中城市为主，以科学技术界为主，以有一定代表性的高、中级知识分子为主的原则；坚持注重质量，保持特色，组织发展与后备干部队伍建设相结合的原则。**

第十五条同第一条遥相呼应。第一条从微观个体角度表述组织发展政策，第十五条则是从宏观整体角度表

述组织发展政策。

第十五条核心关键字是“注重质量”。组织发展质量是人才强社战略实施效果的一项重要检测评估标准。2002年之前讲求N师N员唯职称的年代，质量指标简单归纳为两句话：第一句，年度净增长率控制在5%以内；第二句，年度新发展社员高级职称比例不低于40%。所谓年度净增长率，是指本年度新发展社员人数减去本年度减员社员人数之差占上年度社员人数的百分比，其中年度新发展社员人数属于至关重要的增量指标。2003年以后变化迅猛，两句话已然过时，仅具有参考价值。那么创新性质量标准如何制定？笔者仔细阅读历年组织发展统计报表后得出以下结论：坚持质量第一原则，科学合理地规划年度增量指标应把握三个要领。一是树立强烈的九三学社历史底蕴意识；二是吃透试错、相机抉择、灵活反应、迂回前进等一系列概念的含义；三是吸纳45岁以上成就型中年人与发展44岁以下潜力型青年人（尤其35岁至44岁年龄段更是青年成熟人才大概率分布群体）并举。假若一定要制定量化标准，只好说年度新发展社员高端人才比例不低于40%。高端人才包括高级职称和相当于高级职称人才。究竟哪些人算相当于高级职称人才？目前很难界定，只能靠实践摸索，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二十九条　本社地方组织一般分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包括自治州、直辖市的区）、不设区的市（包括市辖区）三级。（第一款）**

今年即将举行社的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对社章做出修订，如果这一款改成“本社地方组织分省（包括自治区、直辖市）、设区的市（包括自治州、直辖市的区）、县（包括直辖市的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三级”就更加切合社的实际情况。因为，2012年社“十大”社章修订时，已删除旧版社章“一般不在县建立地方组织”这一限制性条款，这便意味着允许在县或县级行政机构建立地方组织。当前，县域经济总量正不断扩大，不少地区省直管县试点逐步推广，为九三学社组织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拿灵活变通式开放条款取代限定式关门条款，预留足够政策空间，拆除政策藩篱，可以说正当其时。从长远角度看，理论上、机会上县级行政机构都存在组建地方组织的可能性。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全社共有29个县级地方组织，分布情况为：浙江7个，甘肃5个，山西3个，福建、湖南、陕西各2个，河北、江苏、山东、湖北、四川、贵州、云南、新疆各1个。期待将来会更多。

**第三十七条　本社基层组织有：直属小组、支社和委员会。基层组织的领导成员每届任期五年。**

在同一单位、系统或地区有社员三人以上，可建立直属小组；有社员七人以上，可建立支社；在社员人数较多的单位、系统或省辖市的区，有三个支社以上时，可设立委员会。

本条介绍了基层组织的三个类型（小组、支社和基层委员会）和三种主要组建形式（按单位组建、按系统组建、按行政区域组建）。

按行政区域组建基层组织主要针对成立县级地方组织难度较大的情况。除非边疆民族地区，凡有一定社员数的县级行政机构一般都没有组建基层组织的政策障碍，不少地方尝试先建基层组织（诸如某某县小组、某某县支社、某某县基层委员会），期待假以时日，水到渠成地升格为地方组织。最近10年，按县级行政区域组建的基层组织数量的确在增多，似乎排队等待政策宽松之日到来，尽早兑现理论上、机会上存在的升格可能性。

最近10年，随着社员人数逐年增加，根据工作需要，规模较大的基层组织即基层委员会数量也在增多。在征求社章修改意见时，有地方组织提议，无需把“三个支社”作为设立基层委员会的先决条件。难道两个支社不行吗？难道两个支社加一个小组不行吗？难道一个支社加一两个小组不行吗？可不可以先把基层委员会架子搭起来，再根据工作需要分封若干下属支社呢？一定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尽可能采用灵活变通式开放条款替代限定式关门条款，何必画地为牢、自捆手脚，思维还停留在“养三只鸭子还是社会主义，养四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僵化定式里。今年社“十一大”再次修订社章，这一合理化建议被吸纳的可能性极大，值得期待。

（本文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组织部干部处处长）

# 卢于道与《科学画报》

陈 巍

我读过1948年以前《科学画报》的全部内容，包括相当枯燥的如讲植物病的文章。我能对科学有一点常识，主要是这份刊物所赐，主编卢于道先生和他的夫人卢邵瀞容的名字，我长志不忘。

——李学勤，2008

我们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希望祖国现代化，我们必须要使祖国科学化。使中国除地大物博之上，再加以科学繁盛。欲达此目的，非先使国民科学化不可。

——卢于道，1936

卢于道（1906-1985），浙江鄞县人（今浙江宁波鄞州区），著名神经解剖学家、生理心理学家与科普先驱，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人脑研究的先锋旗手。卢于道生于贫瘠的年代，长于动荡的岁月，目睹祖国积弱、民智未开的境况。因而卢于道的一生有两大使命：一是科学研究工作，二是科学普及民众，两大使命是为实现卢于道的最高理想——救国于危难中。两大使命与最高理想之间彼此之间相生相长，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卢于道选择科学救国之路迂回前行，他在《中国之科学化运动》中指出，中国现代化要率先科学化，而科学化有两条路可走，“在民族主义的观念之下，要求中国复兴，使中国现代化。第一步即当充分科学化。要走两条路，即研究工作与普及工作，不能仅求中国科学之西洋化。”一条是研究之路，他在《科学与社会》高声呐喊，“吾人在国难期中，更需要全国人士总动员为国效躯，正如班超之投笔从戎。纯粹科学家亦正是努力救国之好机会，一旦有所发明能如巴斯德之发现微生物，而能拯救此困难。”在这里，卢于道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研究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条路则是科普之路，卢于道直言，“科学先民众化，民众自科学矣。这是吾人所应该努力的方向。”其中，《科学画报》是他最重要的据点。

## 科普启民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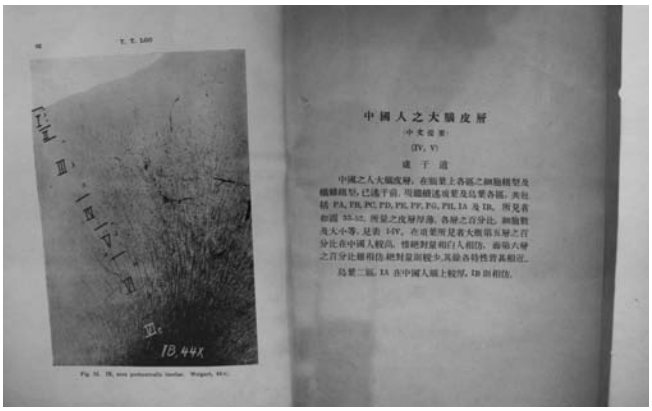
卢于道的科学普及之门是从他的青年时代打开的。1923年，卢于道求学于东南大学，适逢德国哲学家、生物学家汉斯·杜里舒（HansDviesch）教授来东南大学讲学，卢于道便专心笔录教授演讲稿，并将译稿《康德与近代哲学潮流》刊登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之上。卢于道精心编撰的这份讲稿，由18篇文章构成，每篇文章围绕一个主题展开，从而形成系列作品，每篇文章占据《时事新报》大半个版面。可以说，这是卢于道科普事业的始点，他的科普热情得到了激发，他的科普能力得到了训练。

其后，卢于道的科普事业主要围绕着《科学画报》展开。在中国科学社工作时期，在卢于道倡导下，创办了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科普杂志——《科学画报》。1933年6月，中国科学社理事会上，杨孝述关于“举办民众科学化运动”的提案得到了理事杨杏佛先生等人的大力支持并获得通过。卢于道被率先聘为4名常务编辑之一。1933年8月1日，《科学画报》在上海创刊，其主旨是“把普通科学知识和新闻输送到民间去。”《科学画报》一经创刊，卢于道当即为其撰稿并参与编辑工作。

卢于道最初供稿给《科学画报》创刊号的两组文章分别是《生理解剖图说》和《庞大的智星》，也是卢于道暮年之时仅印象最为深刻的两组文章，这两组文章是以连载的形式在《科学画报》上刊发。

《生理解剖图说》是卢于道在《科学画报》创刊号上发布的首篇文章，针对民众普遍缺乏人脑知识的现状，讲述了人脑的生理功能、构造及其进化。当时国际上关于中国人脑劣于西方人脑的观点盛行一时。1926年，香港大学解剖学教授约瑟夫·莱克斯登·谢尔希尔（JosephLexdenShellshear）刊登学术文章《中国人的大脑枕叶上的特例——月状沟》（TheOccipitalLobein

theBrainoftheChinesewithspecialreferencetotheSulcusLunatus），提出中国人脑更接近猿猴的脑，因而中国人脑逊色于西方人脑。然而卢于道并不认同人脑优劣的论调，他于1934-1935年间，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丛刊上连载《中国人的大脑皮层》（TheCerebralCortexofaChineseBrain）、《大脑皮层生后髓鞘之发展》（Postnatalmyelogenesisofthecerebralcortex）等文章，批驳中国人的脑更接近猿猴这种谬论。


中国人之大脑皮层

《中国之大脑皮层》中文提要及插图

为使相关学术成果惠及公众，1937年2月，卢于道撰写《中国人脑及智力》载于《科学的民族复兴》，以更通俗易懂的语言和配图来论证中国人的大脑皮层比之欧美人毫不逊色。考虑到这些文字对于普通受众依旧过于高深，为此，《科学画报》的编辑提出要以最显通俗的文字令读者理解，“特请卢君以最浅显通俗的文字，选择最有兴趣的图画，为本刊阅者特编‘生理解剖图说’分期发表，使国人对于此最深奥的学理，最神秘，最不可思议，与人生有最密切关系的人脑与神经系的作用，均有正确的认识。”继而卢于道的《生理解剖图说》系列文章在《科学画报》第1至第7期上连载特稿，将深奥而又神秘的“人脑”和神经系统间的相互关系及对人的行为的作用，清晰而且生动地展示在读者面前。

为使只有中学水平的读者都能看懂《科学画报》，卢于道等科学工作者选用最浅层的语言组织将科学思想和科学知识表达出来。譬如说选自《生理解剖图说》的《脑的工作》首段，“我们的脑子，是我们的行为主使者。脑的命令叫身体哪一部分动，于是身体哪一部分就动，正犹之船主要船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卢于道采用了极其简单生动的船之比喻句使读者能理解脑之功用。这般良苦用心使得《科学画报》适用对象之广泛，儿童及一般民众都能阅读，销路也一路飙升，最终达成实现广开民智的最终目的。

同时，为了避免只看科普文章令读者产生乏味感，增加《科学画报》的趣味性和生动性，吸引低龄幼儿阅读，卢于道专门撰写了《庞大的智星》。卢于道自叙科学小说有两大目的，第一重目的，“不过假使读者读之能感到兴趣，则本小说之第一使命算达到了。”第二重目的，“读此小说，或能引起科学研究之兴趣，此则和神怪之封神榜西游记诸小说有所不同。”

卢于道也确实落实科学小说的两重目的。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就深受卢于道及《庞大的智星》影响。李学勤曾回忆“说起这两人，我总是戴着敬佩之情，虽然今天我是学了文史，可原来想学科学时。我有一点科学知识都是这两本杂志学来的。”这两人便是卢于道和他的夫人卢邵静容，两本杂志的其一便是《科学画报》。李学勤提及，“他当时特别喜欢卢于道与其夫人合译并连载于《科学画报》的一本小说——《庞大的智星》。”足以可见，卢于道在科学普及工作上无可替代的影响力。

## 科普救危国

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卢于道重新认识科普，令他从科普强国转向科普救国。此前，卢于道一直视科学普及为实现强国的手段，而抗战时期，科普救国成为卢于道主要的信念。在这期间，他不曾中断科普方面的工作。

1937年，《科学画报》因抗战导致稿源受到影响，便于10月改为半月刊。卢于道等科学工作者兢兢业业，尽一己之力维护着《科学画报》，譬如卢于道《科学知识的两重意义》就发表于1941年，正值抗战期间。《科学画报》发行最终虽未因战乱而停止，但版面和内容受到删减，科普工作也变得举步维艰。

于是，卢于道开始参与政治活动以拯救危难之中的中国。1944年，抗日战争形势日益焦灼，这也是抗战博弈最关键的一年，卢于道和潘菽、涂长望教授等组织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身为中国科学社总干事的卢于道当选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协会号召全国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为和平进步而努力。当时，这一目标体现为扩大和巩固爱国统一战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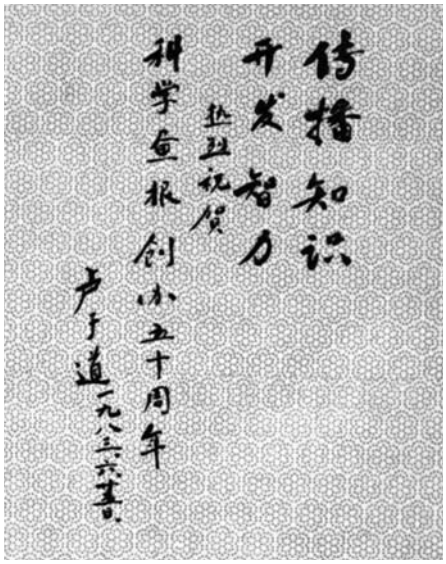
同时，他在重庆还参加许德珩、褚辅成等进步人士领导的“民主科学座谈会”。1945年9月3日，沾满鲜血的旭日旗终于落下。与普通民众的欣喜若狂相异，这群曾游历西方、经历战火的知识分子似乎更为远虑。他们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旗易帜为“九三”座谈会以铭记中华人民所付出的血泪。翌年5月4日，为了预防内战再次带来阵痛，九三学社决定于重庆正式挂牌宣告成立并郑重“停止内战、反对独裁、和平民主”等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复旦教授卢于道在九三学社成立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成立伊始，他就当选为九三学社沪宁区监事，不久又当选为中央常务监事。

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外患消除，时局稳定，于是卢于道选择重新续借“科普”工作。《科学画报》于1947年复刊，卢于道再次作为其特约专家为其撰稿。他持续前期对于脑的科普工作，如《脑的工作》、《脑的保护》、《脑的进化》等。在《科学知识》一文中，他进一步澄清了自己缘何如此重视人之大脑，“我们人之可贵者，就在乎有知识，人脑较动物脑进化之处，就在乎能蕴藏并创造无涯的知识，而知识之中，以科学的知识为最近之金华所得，比较最准确而最合乎理性！这是近代人类重视科学知识之惟一原因。”

根据顾执中自述可以窥见卢于道对于科普工作的重视。1947年，“卢于道跟我认识后，因他所参加的‘科普’没有个开会的地方，经他的介绍，有一次，‘科普’的成员在民治新专的破旧教室中开了会。那时恐怖空气弥漫上海，一般学校机关为了求得本身的安全，不敢随便借给人家开会，而想借人家地翻开会的团体，也恐所借的地方跟国民党反动派有关系，怕在那里开会，有自投罗网的危险。”

卢于道也积极关注和大力支持农业科普。1947年7月，为了弥合农业建设的需要，普及农业知识，中国农业科学研究社（简称中农社）应运而生，汇集一大批在农业机关、农场工作或者从事农业教育的青年学者从事农业工作。致力于科普工作的卢于道专门在中农社成立一周年纪念刊撰文，他指出农业科学普及的重要性，“我国现在正处于革命过程中，这种革命过程是在农村里展开再达到都市，因此农业科学的地位尤其重要，如果农业科学跟不上农村革命，结果不是延迟了中国的现代化，就是将农村的革命工作落了空。”

## 科普促强国




卢于道为《科学画报》创刊五十周年题词

建国后，卢于道的科普工作围绕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上海科普）这个平台展开。1950年11月，上海科普筹委会成立，卢于道任主任委员，1952年1月，上海科普正式成立，卢于道任主任委员，1954年8月，在上海科普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卢于道被选举为主席。1957年成立上海科普出版社，负责《科学画报》的发行。1958年11月20日至23日，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和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大会（简称市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卢于道被选举为副主席。此时，《科学画报》肩负起新的光荣使命：为大规模建设服务，即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服务。“这个科学技术落后现象，是摆在我们工业化前面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是要以教育建设、带领艺徒等各方面来克服；而我们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以及主办的科学画报，亦必须在这个严重问题的解决方面，尽一份力量。”至于该如何施展这份力量，卢于道认为“科学画报不是专门性的技术刊物，而是综合性的通俗科学刊物，因此可以在大规模建设中的科学教育方面担任一部分的任务。”

这段期间，卢于道出国访问交以增加科普经验，尤其是苏联之行让卢于道受益匪浅。1953年，卢于道参加以贺龙为团长的赴朝慰问团。1954年，卢于道参加中国科普代表团成员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访问了当时的“苏联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等单位，汲取苏联科普工

作的经验。卢于道的苏联之行也促成了《科学画报》对苏联科研进展的重点报道。同时期，《科学画报》以专辑的形式，系统化的介绍苏联的科技成就，每一专辑介绍的苏联科技成就几乎占本期篇幅的1/3或1/2不等，内容涉及工农业等各个方面。1954年《科学画报》刊物另辟新栏目——“在兄弟国家里”，介绍社会主义国家主要是苏联的科技成就。回沪后，卢于道根据苏联的经验，加强了上海科普协会的工作。在他主持下，选址上海闹市中心，于1957年建成国内首家长达170米的“科普画廊”，并组织制作、放映深受农民欢迎的农村科普幻灯片。1957年3月，卢于道担任上海自然博物馆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是三位负责人之一。这些科普工作践行了卢于道的科普理念，“科普要面向广大群众、面向工农业生产，才是真正的科普。”

1966年，文革浩劫伊始，卢于道也难以幸免于难，科普工作难以为继。谭其骧回忆道，1966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后，复旦大学开始张贴大字报，隔天晚上，便见到生物系贴出了卢于道的大字报。文革十年动荡，直至1978年，新中国改革开放，此时，卢于道已近杖朝之年，但他以高度的热情参与九三学社的政治活动和科协会议。1980年，中国共产党恢复民主党派组织，恢复九三学社活动。1月12至15日，卢于道出席了九三学社上海市第四次社员代表大会。1982年5月14日至16日，卢于道出席了上海市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副主席。1983年2月2日，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成立30周年，卢于道专门题词祝贺。1983年3月9日九三学社社中央常委会举行第十八次会议，卢于道担任社史工作委员会主任，同年4月20至28日之间，上海市市政协召开六界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上卢于道被选举为副主席。1983年卢于道又以长者般饱含温情的口吻回忆了《科学画报》半个世纪的成长历程以及他与《科学画报》的成长史，并对《科学画报》的未来满怀着希冀，“半个世纪过去了，《科学画报》之‘今’，远非《科学画报》之‘昔’所能相比……我相信，《科学画报》必将取得更大的发展。”1984年9月4日至7日，上海市科协举办第三次代表大会，卢于道被授予市科协名誉会员称号以表彰他长期以来对科协建设的贡献。

（作者为九三学社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绍兴市委委员）

# 褚辅成在狱中

王天松

## 袁世凯的谈话

1916年8月27日，褚辅成在北京遭袁世凯政府的军警执法处逮捕，其他遭逮捕的国会议员还有众议院议员刘恩格、常恒芳，参议院议员丁象谦、朱念祖、赵世钰、张我华、高荫藻，包括褚辅成先生在内共8人，这就是民初有名的“八议员事件”。这八个人都是民初国会参、众两院中有名的“大议员”。而自民初以来，却从来都不与袁世凯唱一个调的人。

褚辅成被逮捕后，先是在北京、天津（曾有解押唐沽受审的计划）两地来回受审，一直到当年的10月中旬还未被定罪。众议院议员邱克庄根据《议院法》第四十条，向袁政府提出质问书，质问书说：“政府对八议员‘既不言罪，又不释放’，究属用意安在？”请政府“即日内答复”，此质问书又由民主党议员梁善济等人连署后上达袁政府。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袁世凯，已经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解散国会、成立“约法会议”的幕后工作。对于议员邱克庄等提出的质问书不于理睬。至11月4日，袁世凯政府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宣布国民党议员助乱证据布

告。在这份布告中，褚辅成作为重要分子，被多次点名。并列举褚辅成等10人勾结李烈均、黄兴等所谓的助乱“铁证”。褚辅成的罪名是：“串通乱党，筹以手枪、炸弹，在京暗杀要人，煽惑军队，扰乱京师”为辞。此时“二次革命”已被袁世凯镇压，因此袁政府在这份布告中令饬解散国民党，并饬追缴国民党国会议员证书、徽章，至使国会及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无法运作。不久，受袁世凯政府操纵的“约法会议”成立，替代了国会参众两院。

褚辅成的罪名已定，但未经宣判，就将褚辅成等三人解往安徽宿州，交由安徽军阀雷震春关押。解押前，袁世凯同参议院议长王家襄有过一次谈话，他说：“八议员问题本可早日解决，惟因褚辅成为叛党中重要人物，证据确凿，致一时难以处置，故迁延至今。然日内终当解决。”并在此前就传出了即将褚辅成解送南方关押的信息。

这次谈话算是袁政府自八议员遭逮捕以来，对参、众两院以及议员们一再向政府提出质问的一次正式回音。此次“八议员事件”中遭到逮捕的八人，个个是一等一的大议员，他们在议会中的一言一行都会对议会中的中小议员产生很大影响。他们是议会中的风向标，他们的言行会对政府的决策以及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在袁世凯看来，既然已经对八议员的所谓罪行以布告的形式作出了结论，在移交关押前他要对参、众两院及议员们的质问做出一个交代。也就是说，这时的袁世凯通过这个谈话要向人们传递出一个“善意”的姿态：你看，褚辅成如此重大的罪名，我老袁还是没有杀他，只是将他关押起来。这实际上是袁世凯为人的一个圆滑和老练之处。

事实上袁世凯没杀褚辅成及其他被逮捕的议员，自有他的打算；一是对褚辅成等人今后或可还有利用价值；二是虽然此时已经将其抓起来了，但他们身后还有强大的国民党势力存在，不杀比杀好，不能因杀了一个褚辅成或其他被捕中的某个人，而得罪了更多的人来与他为敌。袁世凯确实是一个老谋深算的人。11月16日，褚辅成与朱念祖、常恒芳一起被押往南方安徽关押。

## 解押前的风波

袁世凯与王家襄议长谈话后，被捕八议员的去向就明朗化了。但是，袁世凯的谈话也透露出了另一层意思，听其音也让议长王家襄吃一惊，袁世凯说：因为褚辅成是叛党中的重要人物，且所谓“证据确凿”，故而“一时难于处置”，在“难以处置”的话里明显透露出袁世凯对褚辅成的杀机，只是他对褚辅成的处置——杀与不杀，权衡利弊，一时举棋不定而已，一直延到11月4日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前，在他的心中才有了一个判断，决定不杀褚辅成，而采用囚禁的办法。

还在袁政府发布解散国民党令之前，被捕八议员的大多数时间被羁押在天津受审。在京的参众两院从议长到一些议员，除提出质问书外，还有信致国务总理熊希龄和内务部长赵知庵，要求从速了结此案。此时的熊希龄唯袁世凯意志是从，对于八议员事件案子的了结他不便发表意见，而内务部长赵知庵则有信回复：“准予三日内将八议员释放。”不过这一答复无人能信，这八议员的案子除了袁世凯点头外，无人能做出是杀是放的决定来。

就在11月4日袁政府发布解散国民党令布告前，外间有一传闻，八议员中除赵世钰因生病外，其他被捕七议员将于11月1日由津浦路解押南下，再传解沪上。这一消息让参众两院议长王家襄和汤化龙感到担忧。早在八议员被捕后的8月28日、29日两天里，众议院连续两天开会，并做出两项决定：一是对八议员的审讯办法未定以前，政府不得将诸议员解往外地，并通过组织委员会，调查政府是否侵夺议员之权，或被捕议员是否有罪？二是褚辅成等八议员应由大理院为审判机关审判。袁世凯对国会作出的这两项决定没有异议，所以被捕八议员暂时留在了北京，这对于保障八议员的人身安全起到了一定作用。如今重新传出要将被捕八议员解押南下，事情有些不妙。因为八议员离开京城后，将意味着他们的人身安全增加了危险系数。为此，王家襄和汤化龙两议长紧急往询国务院。据熊总理的答复：“断不解押八议员南下。”但熊希龄透露了将褚辅成、常恒芳、朱祖念三人解往南方关押的消息，而决无生命危险。熊总理的答复使王、汤两议长松了一口气，旋告两院会中谓：“此事总理对于议长负责，议长对于两院负责，担保被捕八议员无恙”。

实际上这个事情的反复，说明了当时的形势对于被捕八议员来说确实有些险恶，而形势对于褚辅成来说则

更加不利。事情稍有变故，即有性命之虞。虽然此时的危险状况被暂时关押在天津的八议员并不知晓，而对于两院议长来说，他们对于当时的形势看的比较清楚，亦有担忧，只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感觉到时时有危险向八议员袭来。所以，当得知被捕八议员中的褚辅成、常恒芳、朱祖念将被押往南方的消息确凿后，才有了王、汤两议长紧急往询国务院的事。有了熊希龄的确切答复和袁世凯上述一番想要表达“善意”的谈话。褚辅成等人的人生安全暂保无虞，这让王家襄一颗吊在半空中七上八下的心暂时稳定了下来。

## 雷震春的滑头

作为与褚辅成往昔留日的同学和朋友，王家襄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褚辅成等三人的去向已为大家所知晓，这对于保障褚辅成的人生安全是非常有利的。11 月 16 日，褚辅成、常恒芳、朱祖念三人在军警执法处长陆建章、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的安排下，由警军押送乘坐津浦路列车南下安徽。褚辅成、朱祖念在南宿州交与军阀雷震春关押，而将常恒芳投入安庆军阀倪嗣冲的监狱之中。

雷震春（1862——1919），安徽宿州人，光绪六年（1880 年），雷震春入淮军吴长庆部。光绪八年（1882 年）2 月，雷震春随吴长庆赴朝鲜镇压“壬午兵变”期间结识袁世凯。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雷震春随袁世凯编练新建陆军，任步兵右翼第三营后队领官，从此为袁世凯所倚重。此后在袁世凯的提拔重用下，雷震春一路升迁，官至南洋巡阅副使、陆军第七师师长、京畿军政执法处处长等，成为袁的心腹爱将，春风得意。所以，袁世凯将心头大患的八议员中褚辅成等二人交给雷震春来关押。

作为长期跟随袁世凯一路升迁，并在其身边供职的雷震春，对袁世凯的为人处世、政治手腕知道得一清二楚，因此在他心中多了一个根弦，在袁世凯面前耍了一个滑头。他想，此时的袁世凯不杀褚辅成必有原因。你老袁不杀他们，我也不可更多的得罪于他们，以后如有变故，现在留条后路将来也好见面。所以他并没有将褚辅成立刻投入监狱，而是暂时借用南宿州当地的一个自治公所，将褚辅成等二人临时关押在那里。同时饮食起居上也是招待周备，且允许族人探望晤面。褚辅成是浙江嘉兴人，入狱后家人与老部下经常前去探望，雷震春亦善待之。

不久，雷震春以房屋紧张为由，便将褚辅成等二人送往安庆军阀倪嗣冲处关押，这件事让倪嗣冲有些不爽。虽然雷、倪同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但此时的雷震春官运正在上升通道之中，更为袁世凯所倚重，因此倪嗣冲心中对雷震春的做法有所不满，但也无奈，只好接受。况且接收关押顶头上司的仇人，也能得到老袁的欢心，倪嗣冲这样一想，心中释然，就将褚辅成等二人接收下来。军阀之间的这种心机、暗斗，从侧面也反映出袁世凯北洋统治集团成员之间的虞尔我诈、互相猜疑的阴险嘴脸。不过在这乱世之中，谁不欺诈斗狠，谁就难于在乱世中立足。

从此，褚辅成就被关押在安庆监狱中，直到1916 年 6 月，袁世凯死后才安全出狱，返回老家嘉兴。这是后话，此后再表。

## 袁世凯的心思

将褚辅成关押到了安徽，交给了自己的心腹爱将看管着，这老袁终于放心了。过去在如何处置褚辅成的问题上，一直在袁世凯的心里举棋不定，颇费周折，他在三个问题上进行权衡：

第一个问题，对褚辅成究竟是杀还是不杀？从袁世凯接掌政权前，到“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褚辅成对他老袁的执政造成了许多制约与“麻烦”。早在浙江民政长时，孙中山提出让权于袁世凯，褚辅成就持坚决反对态度；袁世凯接掌政权后，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褚在浙江自搞一套，急于办省议会，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又在省临时议会提出反对中央政府“运动四国续交借款”案，并声明浙江对此项借款“决不承认，照章弹劾”，引起其他省份的连锁反应；到北京任国会议员后又反对五国大借款案，并领衔弹劾；又依据“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对袁政府的一系列人事任免提出严重质问书，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对袁世凯行使总统权力造成巨大约束与不便。想到以往这种种事情，恨不得将其杀之而后快。而如今褚辅成人已被抓，老袁的思绪长着呢，思虑再三，最后决定不杀，而将他囚禁起来，将来对他或许还有利用价值。

第二个问题，决定不杀，那么要选择一个比较妥当

的囚禁之地，这更是一个破费思量的问题。褚辅成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早在孙中山创建同盟会时代，褚辅成就宣誓加入。随后受同盟会总部指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推动浙江革命。辛亥革命时是浙江光复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人。光复后推辞都督职，而任浙江省民政长（即省长），所有省内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皆归其总揽”，在浙江是一个一呼百应式的人物。被免民政长职后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国会宪法起草委员，是一等一的“大议员”，在国会中、小议员中有相当的鼓动性和号召力。对于囚禁这样一个人物，既不能将他关押在北京，又不能将他关押在浙江。那末关押在哪里最妥当？袁世凯想到了一个地方：安徽。这是关押褚辅成的一个最佳的地理位置。

第三个问题，托付给谁来帮助他老袁管押褚辅成，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袁世凯的考虑是周密的。如果关押在北京，国会中的那些民党议员随时可去探望，那等于没抓。不能将其隔离，那末对袁世凯今后的执政还会造成“麻烦”，但更不能关押在浙江。浙江是褚辅成的天下，故旧、学生、部下遍地，只要褚辅成愿意发个话，说不得就能做出不利于老袁的什么事来。何况浙江一直来就不是北洋集团统治的势力范围，更没有他老袁的心腹之人可托付管押，所以，将其关在浙江，那等于是放虎归山，万万不可。

现在，关押的地方选在了安徽，地方选对了还得有一个可托付的心腹之人帮助管押着，而安徽的雷震春、倪嗣冲则是袁世凯的心腹爱将，完全可以托付。雷震春从1895年就跟随袁世凯，一路升迁，官至南洋巡阅副使、陆军第七师师长，授将军府震威将军衔。而倪嗣冲则与袁世凯有更深的家庭渊源，其父是清末举人，曾受聘于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后曾任四川开县、长宁县知县，晚年为袁世凯的亲信幕僚；倪嗣冲以家庭渊源为背景，依附于袁世凯，一路升迁。至清帝退位、南北停战议和、袁世凯接掌民国大总统时，特命倪为豫皖筹边使，而倪则开始拥兵盘踞阜阳一带。民国2年（1913年）6月，袁世凯免去柏文蔚皖督职务，北洋军趁势南下，倪嗣冲乘机率兵攻占省会安庆，进一步扩大了统治地盘。不久，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使倪的势力达到了顶峰时期。有此雷、倪两个心腹爱将把持安徽军政大局，袁世凯放心将褚辅成等三人交于雷、倪管押。

袁世凯的这一招棋局下的极其老到。将褚辅成关押在安徽，既隔离了他与国会议员们的联系，使他无法再对政府的事情“横挑鼻子竖挑眼”。又远离浙江，褚辅成的本事最大，也无法挑起原来的老部下做出于老袁不利的事来。将褚辅成交给雷、倪两个心腹爱将管押，绝对出不了任何问题，自己放心，袁世凯的心思可谓慎密矣，然而雷震春的滑头与私心，则是老袁万万没有想到的。

## 狱中静读阳明书

褚辅成被转交安庆投入监狱，此后两年褚氏就在安庆狱中度过。狱中的管理并不十分严格，虽然不能外出，但在狱中的活动也没有很多的限制。后来虽在狱中再遇险情，乃至有性命之忧，但仍化险为安。此容后细述。

褚辅成的政治性格虽然十分崛强，但同时又是一个有很强自制能力的人。被捕初时在天津受审的三个多月里，还可间有外出之时，只是必有警务人员跟随其后，而被投入安庆监狱后，外出是不允许了。褚氏知道将要在此有一个较长的关押时间，事不可为，不作无谓的牺牲，强迫自己很快静下心来，以适应这里的牢狱生活。

初入安庆牢狱时与常恒芳同关一室，乃因常氏入狱后的激烈反抗，被狱方戴上脚镣，不久又被移至他室关押。褚辅成一人一室，一下子成了“优待生”。但一人一室的时间长了也好不寂寞，为使自己很好的度过有意义的每一天，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个一天的狱中“工作”计划：就是“静坐、读书、阅报”三件事，以后每日不缀，乐此不疲。

读书、阅报是一个政治家每天必须的功课，而褚辅成自青年时代起就已养成了这种良好的习惯。当时倪嗣冲可能也与雷震春有着同样的心理，对褚辅成在狱中的看管并不十分严格。而狱中置有各种书籍、报刊。褚辅成每日阅读自娱，而于《阳明文集》浏览为最多。进而研究《易经》，且颇有心得，后来褚辅成的第三代孙字辈出身，他（她）们的名字都是由《易经》中的坤、卦而来。其次，有沪上各报乃可按月披览，故狱外各种社会新闻乃至重大时事政治动态，如后来帝制之发生及护国军之起事，均所详悉。褚辅成虽身陷囹圄，但监狱中相对宽松的管理环境，通过阅读沪上各种报纸，掌握了解了大量时事政治消息，进而作出自己对

狱外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而帝制的发生，尤为引起褚辅成的高度关注。

实际上作为一个政治犯，此时的褚辅成在监狱中仍能获得这样的待遇，某种程度上与民初较为宽松的政治大环境有关。另外，袁世凯任命倪嗣冲为安徽都督兼署民政长，掌握军政大权，坐镇安徽，受袁世凯之密令，是负有重大军事使命的。首先意在监视徐州的张勋，同时可控河南，一旦北方有事，马上可以凭借津浦铁路，迅速增援调动。二则比较，倪嗣冲认为，此时被关押的的褚辅成等已经不再重要，他们在监狱里再怎么闹也成不了气候。在这样的情况下，放松了对褚辅成的监控。而褚辅成客观上利用了这样的宽松环境，获得许多监狱外的事时政治消息。

除了读书、阅报，褚辅成注意加强体育锻炼，就是每日静坐，进而到站桩。也从那时起还褚辅成自创了一套功夫，叫“无极功”，自此以后一直坚持到他的晚年，每日练功不缀，使他的身体健康收益不浅。直至抗战爆发时，褚辅成已是一个六十六岁高龄的老人了，仍是一头黑发，精神矍铄。

对于褚辅成所创“无极功”，好友黄炎培甚为赞赏。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褚辅成重抄七十感怀之作向黄炎培索和，黄炎培报以两律，就谈到这“无极功”。褚辅成在七十感怀诗中有“人生七十寻常事，欲向亲朋夸古稀”之句，黄炎培则“有情世界新翻局，无极功夫健据鞍”唱和，并在后注里说明：“先生夙行一种健身运动，名无极功。”就这样褚辅成在狱中前后被羁三十四个月，由于自己调控得当，每日坚持静坐、读书、阅报，不但肉体上、在内心精神上也是无所苦痛，到1916年6月26日出狱时，褚氏风采依然。乃高人也！

## 袁氏再起杀心

就这样，远离家乡的褚辅成，在安庆狱中每日以读书、阅报、静坐三件事循环往复，度过每一天。时间一晃就进入了第三个年头的1915年，期间除了接待家人与一些老部下前去探望他外，他将更多的时间化在阅报上，从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探知分析形势，注视着狱外形势的变化。

那袁世凯自从接掌民国大总统后，就做起了皇帝的白日美梦，紧锣密鼓复辟帝制，组建筹安会作为推动帝制的机关，贿买媒体，大造复辟帝制的舆论。褚辅成对报纸上有关袁世凯企图改变国体的各种报道极为关注。尤其当他从报纸上读到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的《本馆启事》后，感到袁世凯的称帝已不可免，这让他心中十分愤慨。

褚辅成从年青时代就投身革命。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建立了功勋，是一位在近代中国从“封建帝制”转向“民主共和”的剧烈的社会变革中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这样一位革命斗士，岂能容忍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得逞。然而，此时的褚辅成被关狱中，虎落平阳，无能为力。但他预感到会在他的身上发生点什么事情。果不其然，事情来了。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下令称帝，31日将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袁在称帝前指使倪嗣冲派人到狱中，以提前出狱到国会任职或回嘉兴老家为说项，引诱褚辅成拥护袁氏当皇帝。褚辅成对来人说：“袁大帅他要当皇帝尽管当，我宁愿待在监狱里比较清静。”直接回绝了袁世凯要他“劝进”表忠，就可回家或继续去国会任职的“好意”，又一次惹怒了袁世凯。不过到现在人们才看出袁世凯的心思之长、之险恶，当初他不杀褚辅成就有此深意的。

袁世凯复辟称帝，他想要许多人劝进，更想要像褚辅成那样的名人劝进，意在全国人民面前造成这是“民意”的假象。而对阻止他复辟称帝的人，就要大开杀戒。浙江是袁世凯称帝最不放心的地方，而褚辅成是他最不放心的一个人。就在袁世凯称帝的1915年这一年，他在浙江杀了许多反对他的革命党人。4月2日，袁世凯指派党徒将阙麟书刺杀于上海。6月2日，指使浙江都督朱瑞将王金发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7月1日，朱瑞再杀革命党人姚勇忱于杭州。11月，同盟会会员、嘉兴籍革命志士陈仲权被袁世凯的党徒毒杀于沪上……。这些人一直来都被袁世凯视作政治上的死敌，故杀之而后快。

袁世凯大杀革命党人，一方面想要扫除复辟帝制的政治障碍，另一方面就是要对褚辅成这样的名人进行威慑，并向他进行“劝进”表忠。现在褚辅成直接拒绝了袁世凯的“好意”，让袁世凯再次起了杀心，指使倪嗣冲要在狱中加害褚辅成。而后来没有杀成的原因有二：一是杨度的缓颊起了作用。杨度是公开支持袁世凯恢复

帝制、实行君子立宪的“筹安会”中六人之首席。但他与褚辅成又同是留日同学，对褚辅成的政治品格内心也是敬佩的，此时杨度想救老同学一命，而杨度的话袁世凯是要听的。提二个原因是由于倪嗣冲母亲的阻止，让倪嗣冲暂时放弃了在狱中加害褚辅成的企图。

## 倪母菩提心

虽然得到杨度的缓颊，但直接加害褚辅成的危险则来自于安庆的狱中，这件事后来被倪嗣冲的绍兴师爷探知。这位绍兴师爷名叫袁天庚，他跟随倪嗣冲已十余年，但他是一位同情革命党、同时具有一定艺术修养的知识分子。对于今年六月同乡王金发被袁世凯的亲信朱瑞枪杀于杭州军人监狱的事就表示愤慨。现在看到袁世凯又要来加害褚辅成，他决定暗中想办法，不能让倪嗣冲帮助袁世凯加害褚辅成的图谋得逞。

就在此时，褚辅成在北洋海军服役的长子褚凤章奉母命，弃职赶到安徽设法营救父亲。褚凤章到安徽后经多方打听，以浙江同乡的关系，经人介绍找到了袁天庚，托他斡旋营救。这时绍兴师爷想到，自己不能直接出面来向倪嗣冲进行劝说，他试图通过倪嗣冲的母亲来说服倪嗣冲放弃加害褚辅成。倪嗣冲的母亲是一位佛教徒，每日吃斋念佛，平日里闲来无事，就邀上都督府属员的内眷们看戏听大书。这绍兴师爷就让自己的妻子陪着倪母看戏、听大书，点演的都是历史上那些爱国者的典故，趁倪老太听到、看到忠臣被奸臣所害，激起满腔义愤的时候，趁机进言。告诉倪母现被关狱中的褚辅成也是一位爱国者，是一位忠臣。现在褚辅成有性命之忧，希望得到倪母的帮助，要设法保全他的性命。在得到倪母的同情后，绍兴师爷就请倪母去说服自己的儿子，不要杀害褚辅成这样的好人。

倪嗣冲是个孝子，倪母的菩提心起了作用，所以倪嗣冲始终不敢杀害褚辅成。这时，全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彼此起伏，袁的亲信最后也是众叛亲离。1月6日，朱执信、陈炯明在惠州等地举兵讨袁。1月中旬，护国战争爆发，南北两军接战于四川。1月27日，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宣告独立。2月22日，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讨袁军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中华革命党的讨袁斗争。3月中旬，南方陆荣廷、陈炳焜等宣布与滇、黔联合，维持共和。等等。在此压力之下，袁世凯于3月22日被迫申令取消帝制，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五年。这时全国各省议会及许多议员要求释放褚辅成的呼吁声渐高。此时的倪嗣冲大概也感受到了压力，也想积点德留条后路吧，最后暂缓了加害褚辅成的行动。直到袁世凯一死，北洋集团分崩离析，倪嗣冲失去靠山，在上述多种因素的促成下，反而主动电请黎元洪政府开释褚辅成。褚辅成在安庆狱中逃过一劫。

## 出狱南归

历史走到了二十世纪初，还想在中国复辟帝制，只能死路一条。终于袁世凯建立以“洪宪”为年号的中华帝国未能成功，1916年6月6日，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愤成疾而死。次日，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临时约法，召集国会。这时褚辅成还在安庆狱中，在国会的国民党大议员如王正廷、殷汝骊等，与成辅成关系密切的各省议会、议员，浙江旅沪学会虞和德、浙江参议会、都督吕公望等，纷纷以团体或个人名义致电黎大总统，要求从速开释褚辅成，以慰人心。现录数条以下：

6月13日，王正廷、殷汝骊等致电黎元洪谓：“黎大总统钧鉴：浙省众议员褚辅成、杭辛斋咸以无故被捕，褚羁皖垣已历三载，杭囚京狱亦逾半稔，徒以热心国事致陷罗织。现当革新之际，请速分饬刻日释放，以重人道而慰舆情。”

6月15日，旅沪安徽省议员管鹏等致电黎元洪谓：“黎大总统钧鉴：……常恒芳、褚辅成、朱祖念囚皖三年，当此回复法治，召集国会在即，拟恳讯饬开释，以慰人心。”

同日，浙江旅沪学会虞和德等致电黎元洪谓：“黎大总统钧鉴：会员、众议院议员褚辅成，明习政治，办事有才。国会未解散以前，无辜被捕，由津羁皖，迄今三载。现当革新之际，请电饬皖省长官，从速释放，同深铭感。”

6月23日，浙江参议会致电黎总统、段总理谓：“黎大总统、段芝泉先生钧鉴：众议院议员褚辅成无辜被逮，于今三年。法治国不应有非法之监禁，乞速令释。”

6月24日，浙议员殷汝骊等电致汤济武谓：“北京六国饭店六号汤济武先生鉴：褚辅成、常恒芳二君，倪已电请开释。祈速向国务院接洽为荷。”

同日，浙江都督吕公望电黎元洪总统谓：“北京黎

大总统鉴：国会议员褚辅成、常恒芳，无罪久禁。前由在沪议员，电请释放。奉总统复电，已交院核办，迄今多日，未见实行。褚、常两议员，本无罪之人，横被拘禁。现在是非已明，当然省释。与有罪已经科刑，须经特赦手续者不同，应请迅赐电皖释放，以慰人心，而昭公道。”

在国会议员及各地议会、友好人士的催促下，黎元洪电令倪嗣冲，释放褚辅成。1916年6月26日褚辅成在安庆顺利出狱。为了答谢大家对他的关心与支持，出狱当日，与常恒芳在《中华新报》、《申报》上分别刊登出狱电，并转各界谓：“今日出狱”。次日，褚辅成乘火车到上海。30日回到嘉兴原籍。嘉兴地方官府、绅商学界千余人到车站迎接，并在嘉兴县学明伦堂召开欢迎大会。当时上海的《申江日报》即后来的《申报》作了全景式跟踪报道，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1916年7月4日《申报》报道谓：“前众议院众议员褚辅成君自恢复自由后，于六月三十日由沪乘四号车抵嘉兴原籍，该处士绅袁知事均在车站欢迎。褚君久别故乡，一见地方父老极为欢洽，遂至南门外东棚下省其家族。并拟即日来杭一行，谒见吕都督后，再联络国会议员晋京。

“又嘉兴函云：国会议员褚辅成出狱归乡，于昨日上午十时十一分自沪乘车旋禾，由自治会、商会、各学校、各团体、嘉兴县知事袁寅昉君、缉私统领赵朗清及绅、商、学均到车站欢迎，约一千余人。褚先生下车后，徐步而行，握手相见，齐集嘉兴县学明伦堂开欢迎会，男女各生均到会。首由顾宗况宣布开会宗旨，盛国兰读颂词后，由潘谋先、吴宏葵、范拱薇（古农）、计仰仙、沈辅之诸君相继演说。褚先生略述在皖狱中情况，并前在乡提创学校、实业诸事。又述及各县钱粮以嘉兴为最重，拟即以减赋方法，最先研究等语。下午四时散会。”

7月6日，与章太炎相约赴杭，出席浙江参议会为他与章太炎出狱举行的欢迎大会，并发表演讲。他希望国家日见进步，表示要以国民为后盾，继续为国效力。会后赴沪，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7月15日，出席粤省驻沪国会议员欢迎孙中山诸名流的茶话会，褚辅成再次发表演讲，他说“民国三年之党争，绝非党争，乃国民与袁世凯之恶政策争。故吾人今后宜抱持正当之义，振奋精神以为之。”被羁34月牢狱之苦的褚辅成丰采依然，他的演讲得到孙中山先生的高度赞扬。7月23日，褚辅成北上，重入国会。

1917年，国会再度分裂，褚辅成南下辅助孙中山建立护法政府，成为实际主持护法国会工作的代理议长。

# 浅析民主科学座谈会的真相

孙 亮

民主科学座谈会是否存在？是否为我社“前身”？对这两个问题笔者持肯定态度，下面分别阐述理由。

## 一、民主科学座谈会存在的理由

### （一）文件手稿和主要创始人的回忆相互印证

根据《九三学社》手稿和“九三学社概要”中的记述。《九三学社》手稿由许德珩先生写于1946年年底，它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总结我社早期历史的书面材料。这份手稿中说：“九三学社是战时由在重庆的一部分文化教育界、金融工商界的朋友们以及其他的自由职业者们一种座谈会的集会演进而成立的。……最初是采取一种非定期的不拘形式的谈话会。”“九三学社概要”

是由许德珩、薛愚、黄国璋、潘菽、笪移今于1949年6月起草向新政协筹备会介绍我社从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期间开展工作的文件，是目前发现的对我社早期历史总结的重要文件。这份文件中说：“本社是对日抗战胜利结束前一年，在重庆一部分民主的文化界、教育界、自由职业者由一种座谈式的集合，演进而成的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原名民主科学社。”这两份历史可信度极高的手稿和文件当中虽未提到“民主科学座谈会”，但明确指出，我社最初是“一种座谈式的集合”，说明座谈会存在，只是名称不详。

根据我社主要创始人的回忆，座谈会的名称就是“民主科学座谈会”。许德珩先生在《毛泽东和九三学社》中说：“我们把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并逐渐演进成为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后来……就把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因此有一个时期座谈会是没有名称的。”潘菽先生追忆“民主科学座谈会”成立缘起时说：“我第一次就和黄国璋先生去了。在许老家里时，每次都要吃饭，在吃饭前互相谈谈。没有经过多次以后，我又介绍税西恒同志也来参加。……过了不久，我又把学校里座谈会的同志陆续介绍进来。此外还有一些从别的方面参加进来的人。这样，座谈会就相当有规模了，代表的方面也比较广了。这时也已经接近抗战胜利的日子，这时有一部分同志感觉到这个座谈会应该有一个名称。许老曾提议可以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大家对此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这个名称也没有对外公开用过。”金善宝先生在《风雨同舟忆当年》中说：“由许德珩、税西恒等人发起了民主科学座谈会。”

为何采信以上三位先生的回忆？因为他们是我社的主要创始人，尤其许德珩先生和潘菽先生在我社的创始过程中地位特殊。许德珩先生是座谈会的主要发起人，最初座谈的地点主要是在许老家中，每次座谈他都参加，而且他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名称的提议者，印象深刻。潘菽先生为座谈会的壮大乃至形成规模可谓功不可没，正是由于1944年底黄国璋先生的引见，许德珩先生和潘菽先生这两位北京大学的校友，五四运动时彼此闻名而不相识的难友重聚，一谈倾心。随后又由潘菽先生牵线搭桥，把税西恒和“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梁希、涂长望、金善宝等学者介绍陆续加入许德珩先生的座谈会。座谈会才由最初的五六个人不断扩大形成规模，逐步具备政治团体的雏形，也才有了命名的需要。潘菽先生能把如此众多的学者吸收进座谈会，显示出他非同一般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也显示出他的学识和人品，他的回忆自然可信度极高。同样，金善宝先生的回忆可印证许德珩先生和潘菽先生的回忆。

综上，手稿和文件证明座谈会存在，我社主要创始人的回忆证明这个座谈会的名称就是“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些史料相互印证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确实存在。

### （二）座谈会名称与政治主张契合

当时我社前辈之所以聚会座谈，正是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对外，国民党消极抗战，前线战事败退，豫湘桂会战出现大溃败，桂林失守，川黔吃紧。对内，国民党强化独裁统治，腐败严重，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残酷的现实让我社前辈认识到没有民主，就不能外御强寇，因而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以来反帝反封建精神，努力实现人民民主和人民科学。所以民主和科学不仅是座谈会的中心议题，更是座谈会所有参与者的奋斗目标。故当许德珩先生提议此名时，当时参会者均未提出不同意见，算是默认，就因为这个名称和座谈会的主旨精神契合。

### （三）对质疑的回应

质疑“民主科学座谈会”存在的声音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一些我社的创建者在谈及我社早期历史时，没有提到“民主科学座谈会”，只提到“民主科学社”。如初大告先生说：“许老一九四五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

要回应第一种质疑，笔者认为有必要厘清“民主科学座谈会”与“民主科学社”的关系。笔者将谈及“民主科学座谈会”与“民主科学社”关系的现有资料按照时间顺序整理如下。

最早的“九三学社概要”中说“由一种座谈式的集合演进而成民主科学社”。其次是1950年许老在我社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他说：“1944年11月，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所以这一座谈会取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称之为“民主科学社”。再次就是许老1983年11月

发表在《人物》杂志第六期的文章《毛泽东和九三学社》，即本文开篇引用的那篇文章，文章说座谈会名称初为“民主科学座谈会”，后变为“民主科学社”，再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名称。

分析以上资料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先有“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才有“民主科学社”。二是“民主科学座谈会”等同于“民主科学社”。究竟采信哪一种说法，笔者认为，时间越接近历史事件发生年代的记录越为真，文件记录比个人回忆更可信。所以笔者采信“九三学社概要”中的说法，先有“座谈式的集合”即“民主科学座谈会”，后有“民主科学社”。而且根据许德珩和潘菽先生的回忆，再后来座谈会的名称被取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名称。

那为何初大告先生等人只知道“民主科学社”，而不知道“民主科学座谈会”呢？要考虑当时具体的的历史情形，尤其要注意二个历史事实。一个是座谈会的名称不断在变，每个名称的持续时间阶段也无文字记录，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名称，也从未对外用过。二是我社在当时是一个以聚餐聚谈形式活动的学术性政治团体，没有规章制度，每次聚会时间、地点、人员都不确定，也无任何文字记录。基于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初大告先生情况的出现存在以下两种可能性。一是当事人没有参加许老提议可以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的那次聚会，后无人提起，也无记录可查，不知道此事。二是参加时间稍晚，当时座谈会名称已更改为“民主科学社”。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我社的创建者在谈及我社早期历史时，没有提到任何座谈会。对于此种质疑，很可能参加者加入之时正逢座谈会没有名称阶段。

第三种情况是一些研究者反复查阅《新华日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当年的报刊杂志，找不到关于“民主科学座谈会”或“民主科学社”的相关报道。根据潘菽先生的回忆，其原因在于“这个名称也没有对外公开用过”。

## 二、民主科学座谈会是我社前身的理由

质疑之声主要集中于我社前身究竟是“民主科学座谈会”，还是“民主科学社”。如谢立惠先生在《回忆九三学社成立前后的一些活动片段》中说：“九三学社的前身是民主科学社，而民主科学社又是由两个座谈会建立起来的，一个是民主科学座谈会，另一个是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再如1983年修订《九三学社章程》总纲时，也把“民主科学社”作为我社前身写进了概述。虽然1989年再次修订《九三学社章程》时，把我社前身由“民主科学社”改成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并沿袭至今，但其中的疑窦并未解开。

解开疑窦才能回应质疑。对于谢立惠先生的看法，笔者认为是当事人认识的不同。谢立惠先生最初是“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后由潘菽先生介绍进入许老的座谈会，在他看来，“民主科学座谈会”和“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一样，在这两个地位平等的座谈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组织不可能再用原先任何一个座谈会的名称，应用新名称。而在许老等人看来，民主科学社并非是两个座谈会的合并，是在潘菽先生的介绍下，“重庆自然科学座谈会”的部分成员加入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理应用原先的名称。还存在一种可能，在谢立惠先生看来，“民主科学座谈会”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团体，所以不能算作我社的前身。但是按照潘菽先生的回忆，“民主科学座谈会”当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和代表性，已具备政治团体的雏形，完全有资格作为我社的前身。

## 后记

对于我社前身这一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我社成立初期的文件记录等资料极少，现有资料多是当事人的回忆，历史久远，记忆模糊，对同一问题有不同看法和描述造成的。即便是许老本人，对“民主科学座谈会”和“民主科学社”关系的阐述也有前后不相符之处。所以对于社史工作者，不断收集材料，辨别真伪，进行分析、推理，得出结论，据此修订社史，是其分内之责，责无旁贷，也唯有此，才能正本清源，达到还原历史真相的目的。

（本文作者为社中央研究室社史研究处副处级调研员）

# 社史人物

杨振声（1890 – 1956）

杨振声，字今甫，亦作金甫，笔名希声，山东蓬莱（今蓬莱市）水城村人。杨振声与许德珩是大学同学，是九三学社早期重要成员，现代著名教育家、作家、教授，曾任国立青岛大学（今山东大学的前身）校长。

杨振声少时在家乡读书，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1918年与进步同学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任编辑部书记。191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专攻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获博士学位，又入哈佛大学攻读教育心理学。1924年回到祖国，投身于教育事业，历任武昌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教授。

1930年任国立青岛大学校长，任职期间，民主办学，广罗人才，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实际情况，吸收国外先进经验，一时间学者名流云集，人才济济，灿若群星，迎来国立青岛大学（现山东大学）第一个黄金时代。他不辞劳苦，亲自开设“小说作法”课。1933年，杨振声受教育部委托，主编《高小实验国语教科书》和《中学国文教科书》；同时与沈从文合作编辑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

1938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中文系教授。1946年负责北京大学北迁筹备工作，并任教。同年与沈从文、冯至合作编辑《现代文录》，主编《经世日报·文艺周刊》。

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声仍于北京大学任教，兼任北京市文联创作部部长。1952年调任长春东北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学史教研室主任，当选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长春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长春分社委员。1956年，病逝于北京，终年66岁。临终，唯一的遗嘱是将其全部藏书（2379册）捐给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图书馆。

严仁英（1913 – 2017）

严仁英，1913年11月26日生于中国天津。1951年12月加入九三学社，曾任九三学社中央第六至八届常委，全国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届代表，全国政协第二、三届委员。2017年4月16日13时2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104岁。

严仁英，1932年毕业于南开中学，1940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严仁英1946年来到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北大医院），投身于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门下，1948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深造。新中国成立，严仁英与丈夫北大医院皮肤科教授王光超不顾美方阻挠，毅然回到新中国，回到北京医学院妇产科，为这个“一人入院，两人出院”的甜蜜事业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66岁以前，她是中国最出类拔萃的产科医生之一；66岁之后，她转攻围产保健，创建了北京大学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大力开展以降低孕产妇和围产儿死亡率为目标的科研工作。1988年她领导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并当选为首任主任委员，10年后又创办了《中华围产医学》杂志，为提高我国围产医学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曾任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妇儿保健研究培训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名誉主任、中国关心下一代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会长。

傅世春（1916 － 2017）

陈学俊（1919 － 2017）

傅世春，汉族，湖北武汉人，1916年2月6日出生，1948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九三学社青海省第一届委员会主委，第二、三届委员会名誉主委，青海医学院原主任医师、教授、院长，政协青海省第四、五、六届委员会副主席傅世春，于2017年2月8日18时35分（北京时间）在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因病逝世，享年101岁。

傅世春1941年6月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后，任齐鲁大学附属医院内科住院医师。1945年7月至1948年8月曾任重庆大学医学院内科主任医师、内科副主任、主任；1952年10月历任四川医学院副教授、门诊部主任；1960年调至青海医学院，历任教授、副院长、院长。

1981年2月，傅世春与王本寅就成立九三学社西宁直属小组的建议得到青海省委统战部采纳，6月15日，社中央批准成立九三学社西宁直属小组，并指定傅世春为小组负责人。1983年3月，经社中央批准，九三学社西宁直属小组更名为九三学社青海直属小组，并筹备建立青海分社。在当年8月召开的九三学社青海分社成立暨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青海分社第一届委员会，傅世春任主任委员，同时被选举为九三学社四大代表。1983年12月起，先后担任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九届中央参议委员会常务委员。傅世春任青海省委一届委员会主委，二、三届委员会名誉主委。从1981年11月至1993年1月，傅世春任政协青海省第四至六届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定居美国。

陈学俊，1919年3月5日出生于安徽滁县，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九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名誉副主席。2017年7月4日2时26分在西安逝世。

陈学俊193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重庆）机械系，1946年获美国普渡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1939年至1949年在重庆及上海中央工业试验所工作，1947年起兼任交通大学教授，1950年起任交通大学专任教授、锅炉教研室主任、动力机械系副主任。1957年响应国家号召积极拥护交大迁校，举家西迁。1957年起一直在西安交通大学从事教学及科研工作，历任教研室主任、动力机械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副校长、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6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现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陈学俊是我国热能工程学科的创始人之一、多相流热物理学科的先行者和奠基人。他于上世纪50年代初筹建了我国高校中第一个锅炉专业，开出了锅炉专业的全部课程；筹建了我国高校第一个工程热物理研究所；组建了我国第一个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能源动力工程专家和教育家，为我国能源动力工程科学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 消息与动态

## 纪念吴阶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纪念吴阶平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1月20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出席座谈会并在会前会见吴阶平同志亲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在座谈会上讲话。座谈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出席座谈会。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发言。

邵鸿说，吴阶平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伟大时代变革。吴阶平是九三学社杰出领导人，为九三学社事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1952年，吴阶平加入九三学社，成为建国后最早入社的一批社员。1992年，年逾古稀的吴阶平当选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他带领九三学社各级组织和广大社员，大胆尝试，积极探索，不断创新，推动九三学社在各方面取得很大进展。2002年12月以后，吴阶平作为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仍然十分关心九三学社新老交替和政治交接，关注中青年社员成长，为九三学社履行职能提供咨询建议，为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殚精竭虑，真正做到了追求不懈，奋斗不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戴海青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2017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3月8日在北京举行。九三学社海南省委妇委会委员、九三学社海南省中医院支社副主委、海南省中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戴海青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戴海青从事临床一线工作30年，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身，中西医并重。她率先在妇产科病房成立优质护理示范病区，中医护理模式病房，带动并培养了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效益型、和谐型岗位能手，获得国家级、省级、院级多项荣誉。她积极参与公益事业，每年下乡义诊，普及健康防护知识；踊跃参加义务献血，扶助孤寡老弱患者。她多年门诊量屡居医院前茅，年专家门诊量5000余人次，从医30年来从未发生过患者投诉及医疗差错。她创建海南省中医妇科专业委员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联合会中医妇科常务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妇科常委。

## 纪念王选同志诞辰8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3月17日上午，纪念王选同志诞辰80周年座谈会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在讲话中强调，要把王选精神化为实际行动，以议政监督协商新成果、服务社会新贡献、自身建设新成绩，迎接中共十九大和九三学社十一大召开。

韩启德在讲话中回顾了王选同志的一生，强调王选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献身科学、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懈奋斗的一生。他的非凡业绩和杰出贡献，深深铭记在科技工作者心中。他的高尚品格和崇高精神，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生楷模。

座谈会上，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海鹰，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敖英芳，中国印刷技术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陈迎新，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高文，方正集团党委书记生玉海，《王选》纪录片制片人杨丽，王选同志学生代表、北大计算机所所长郭宗明，王选同志生前秘书、王选纪念室主任丛中笑，王选同志夫人陈堃銶等先后发言。

与会人员还共同观看了纪录片《王选》片花。

座谈会由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丛斌主持。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马大龙，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副主席田刚，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农工党中央副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副主席严以新，台盟中央副主席吴国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副主任丛兵，中国工程院副院长陈左宁等近 200 人出席会议。

## 《九三学社上海先贤（第一辑）》出版

4 月，《九三学社上海先贤（第一辑）》由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以先贤的出生年月为序，以其主要事迹和在沪活动为主线分篇撰写，先期收录了褚辅成、颜福庆、谷镜汧、周志宏、苏祖斐、董承琅、王淑贞、朱物华、陈植、顾翼东、余瀓、郭秉宽、卢于道、叶衍庆、苏德隆、王应睐、笪移今、谭其骧、汪定曾、卢鹤绂、张钟 俊、王德宝、陈从周、孟庆闻、温可铮等二十五位先贤人物，具有图文并茂、史料翔实、重点突出等特点。

本书是为了纪念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 70 周年，在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的精心组织下，在社市委理论和社史研究中心及社复旦大学委员会、上海交通大学委员会等基层组织的共同参与下，完成出版的。

## 严仁英同志逝世

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我国著名妇产科、妇女保健学专家、原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妇幼卫生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名誉主任、中华围产医学杂志创始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名誉院长、终身教授、原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科主任、北京大学妇儿保健中心主任、世界卫生组织妇儿保健研究培训合作中心主任，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第三、五、六、七、八届代表、九三学社中央第六、七、八届中央常务委员、“中国围产保健之母”严仁英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4 月 16 日 13 时 24 分在北京逝世，享年 104 岁。

## 九三学社 8 位社员荣获 2017 年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4 月 27 日，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陈列、蒋绮云、李志敏、孙元华、吴红卫、杨晓、张文瑞、郑家文等 8 位九三学社社员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陈列是中铁二院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工程师，他主持设计的跨度 128 米下承式钢系杆拱桥和采用减隔震支座的 144 米多跨混凝土连续梁均为国内首次在高速铁路中采用的结构形式；蒋绮云是新兴际华集团橡胶技术首席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她从事橡胶应用技术研究近 30 年，多项研究成果为国际领先或填补国内空白；李志敏是平顶山市第一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她从医 39 年，专攻眼病临床治疗，每年接诊病人上万人次，治愈住院病人 7000 余例；孙元华是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焦炉车辆公司焦炉机械设计院副院，她主持完成的自主创新成果——鞍钢化工 7 米焦炉工程项目（国家 863）“新型液压交换机”软、硬件电气系统，打破了该领域的国外垄断地位，添补了国内空白，每套直接节约外汇成本近 30 万欧元；吴红卫是营口市中心医院肿瘤科主任，，她主持的“CT 定位在普通放射治疗中的应用优势”科研项目，用精确放疗 CT 定位系统取代普通二维定位，既提高了放疗疗效，减轻了放疗对患者造成的损伤，又减少了患者医疗费用的支出；杨晓是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动力总成总工程师，从业 24 年，他主导研发了三大系列、55 款小排量发动机，并对发动机进行了整车动力性、经济性的集成应用；张文瑞，蓝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他从摆地摊起步，2005 年创办张家口市首家四星级酒店——蓝鲸大厦，十八大以来，实现了由酒店业向旅游业的华丽转身，快速发展为以旅游业为主业、多元化并举的现代化企业集团，现有子公司 23 家，员工 2000 多人；郑家文是保山市农业科学研究所麦类室主任，他主持“水稻低温冷害”和“水稻扣种稀播培育带蘖壮秧”课题研究，解决了中高海拔地区水稻低温冷害和稳产高产问题。

自 1985 年开始，全国总工会开展全国五一劳动奖状、奖章评选表彰活动。今年共有 99 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694 名先进个人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800 个先进集体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其中，共有 28 位民主党派成员及无党派人士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九三学社8人，民盟5人，民建2人，农工党2人，无党派人士11人。

## 纪念王淦昌诞辰110周年活动在常熟举行

5月27日，纪念王淦昌诞辰110周年活动在常熟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韩启德专门为王淦昌先生诞辰110周年题词“殊勋耀华夏 大范垂后昆”。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九三学社江苏省委主委、江苏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周岚出席纪念活动。

邵鸿代表九三学社中央讲话。邵鸿着重从九三学社的角度追忆了王淦昌先生的丰功伟绩。他指出，王淦昌先生不仅是卓越的科学家，同时也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民主党派代表人士。王淦昌先生是九三学社的骄傲，是全体九三人永远铭记敬仰的楷模。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体现了九三学社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和精神。他强调，纪念王淦昌先生，就一定要继承和学习他的崇高精神，努力履行好参政党职能，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作出自己的贡献。

## 杨钟健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举行

6月1日是杨钟健院士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纪念杨钟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出席会议并讲话。

韩启德指出，杨钟健院士的一生是一本厚厚的“大书”。书中有科学救国的爱国情怀、有专注如一的科学精神、有栽培桃李的育人远见，是“爱国、科学、民主”精神的先贤楷模，启迪、激励着后人。韩启德号召广大科技工作者继承和发扬杨钟健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的科学精神，为科学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科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中科院古脊椎所所长周忠和，西北大学副校长张云翔，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孟庆金，杨钟健之孙杨大同等在会上先后发言。同日还举行了《奠基伟业 传奇一生——杨钟健院士年谱及纪念图集》一书首发式。

杨钟健院士诞辰12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由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中科院古脊椎所、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和莱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来自中科院、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北京自然博物馆、重庆自然博物馆、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等单位专家学者，以及杨钟健亲属等近200人出席在京纪念活动。

## 陈学俊同志逝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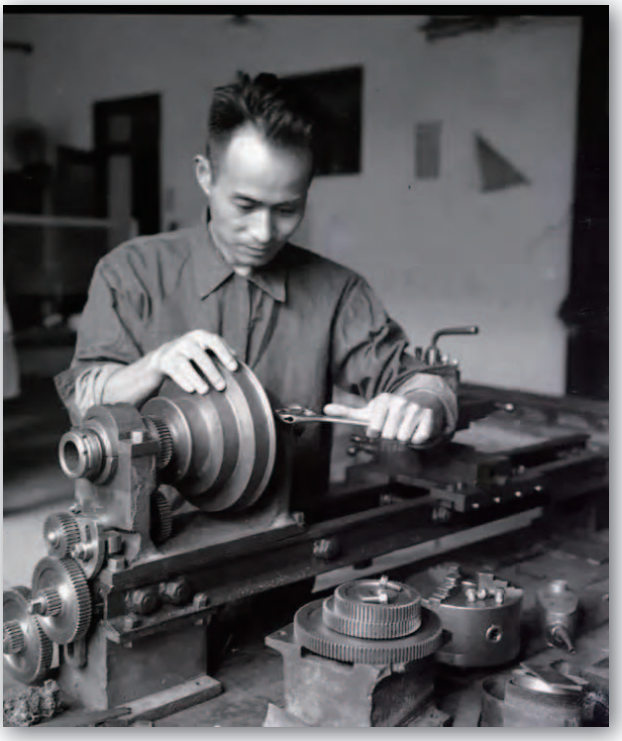
我国著名的能源动力科学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第八、九届中央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十、十一届中央名誉副主席，陕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九三学社陕西省委原主委，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热物理学会原理事长，西安交通大学原副校长、动力工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名誉主任陈学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7年7月4日2时26分在西安逝世，享年99岁。

## 纪念潘菽诞辰12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纪念潘菽先生诞辰120周年座谈会7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在讲话中深情缅怀潘菽的非凡业绩和杰出贡献，强调要学习他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不懈奋斗的高尚品格和理想追求。

韩启德强调，潘菽是九三学社主要创始人之一。抗战胜利前夕，他与许德珩等人发起组织九三学社的前身——“民主科学座谈会”。在筹备九三学社过程中，潘菽根据周恩来建议，先后介绍“自然科学座谈会”成员及其他一些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参加九三学社，对形成九三学社组织特色起到决定性作用。在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成立大会上，潘菽被推举为理事，此后一直担任九三学社重要领导人，为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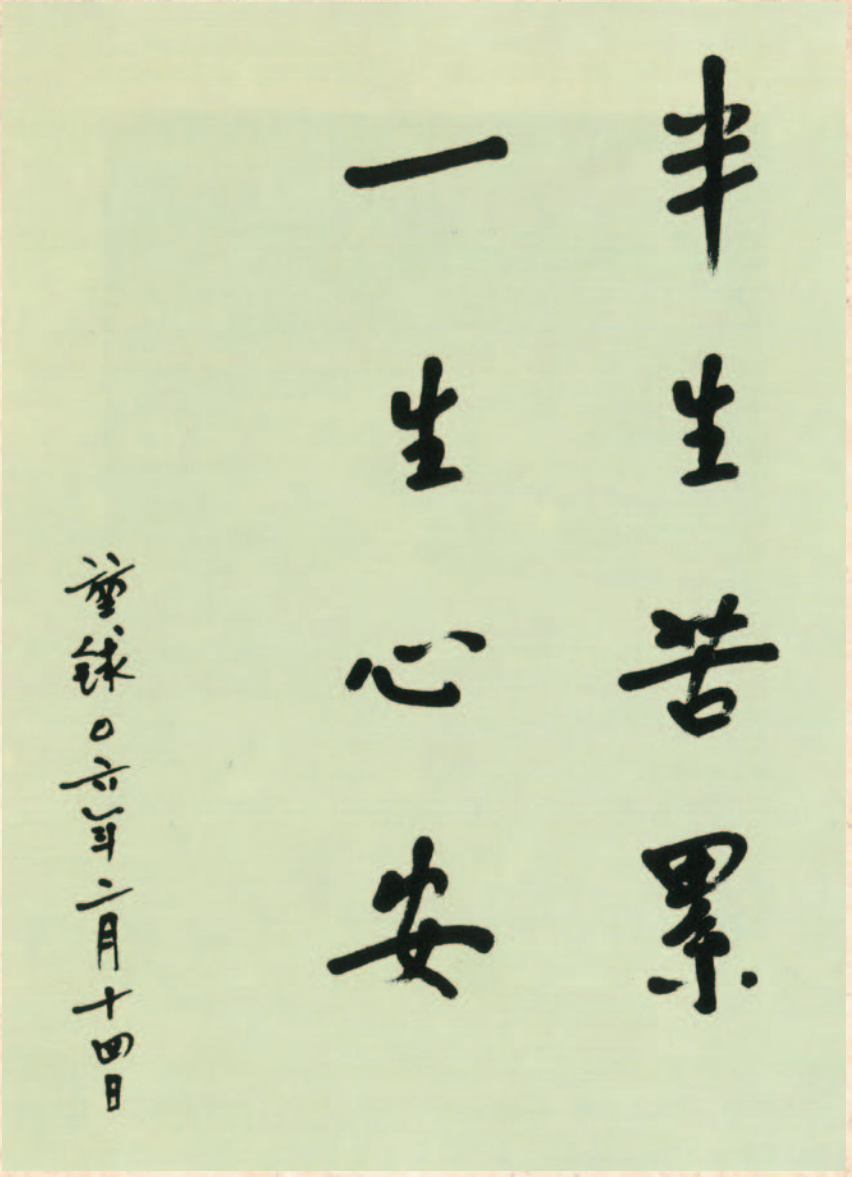
座谈会由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副主席邵鸿主持。中共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朱庆葆，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傅小兰，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周仁来，天津师范大学教授白学军、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胡德平，中科院副院长张涛，九三学社江苏省委副主委陆延青，潘菽之孙潘垚天等先后发言，从不同侧面追忆潘菽光辉一生，缅怀潘菽的不朽功绩。来自九三学社、南京大学、中国心理学界及潘菽后人等90余人出席会议。



陈学俊在实验室。

陈学俊学术著作（部分）。

1981年，陈学俊（右）访问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机械系并与热传学著名教授爱克特合影。




王选逝世后第二天，夫人陈堃銶写下的挽联。